

电影改变我们村

—— 社区拍摄初探



512 中心
512 NGO
Service Center
in Sichuan



社区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缘起】

- 一颗种子 何德贤 (4)
- 新的工作方法的尝试 高圭滋 (5)



【总论】

- 剖想参与式社区拍摄 田 犇 (8)

【当村里有了摄影机】

- 讲述耳朵的故事——什邡市湍氏镇桐林村
..... 肖志欣 (16)
- 山路——小金县美沃乡和尚村
..... 高雪松 (26)
- 不变的快乐和无声的改变——茂县松坪沟乡岩窝村
..... 马志勇 刘易平 (33)
- 留守老人的孤寂——广汉市松林镇滴水岩村
..... 莫尚凝 (44)



【社区拍摄的土壤与阳光空气】

- 镜头的迷思 莫尚凝 陈惠芳 (56)
- 社区就是土壤 高雪松 陈惠芳 (59)
- 美丽的相遇 马志勇 刘易平 陈惠芳 (62)
- 从理念到实践——参与式社区拍摄项目的操作
..... 马志勇 (65)
- 参与式社区拍摄培训 邹 乔 田 犇 (71)

【附录】

- 附表 1: 社区伙伴第一次社区拍摄培训日程 ... (85)
- 附表 2: 不同团体对于社区拍摄的理解 (88)
- 附表 3: 社区伙伴第二次社区拍摄培训日程 ... (89)
- 附表 4: 社区伙伴第三次社区拍摄培训日程 ... (90)
- 附表 5: 512 中心的两天集中培训 (92)
- 附表 6: 512 中心的社区拍摄社区工作坊 ... (95)

缘起.....



一颗种子

何德贤

社区伙伴四川项目统筹

2011年2月中旬的一天,编者要求我重说社区拍摄项目的缘起。

感觉有点远……不单是因为生活与工作忙碌。就是阶段性因工作须要,去到曾受地震严重影响的灾区时,一所所建筑宏伟的学校、一栋栋带有地方民俗风情的新楼房、一张张生活如常的面孔,都好像在诉说伤害已成历史,新生活摆在面前,要忙着去奋斗。生存本来就要有往前冲的力量,正常也应该的。但是,那种“震”出来的觉悟在哪?它曾发生过吗?尽管记忆是脆弱的,这期间的记录是认真的。留给别人,及自己。

社区伙伴作为一个社区发展机构,一直与合作社区和群体探讨对可持续生活的理解,以及实现的道路与方法。面对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巨大的重建工作时,除了加入来自四方八面的支持机构,以资金支持受灾群众重建房子、道路、小水利等基础设施外,这极大的自然灾害究竟如何引发人们对自然、对个人生活、以及对人与社区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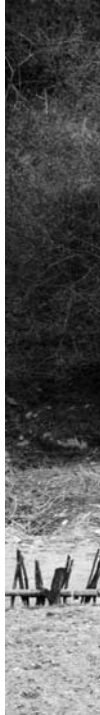
在灾区,我们看见也听到许多动人故事。受灾个体作为受害者的同时,许多也扮演着爱的施与者的角色。面对自然的力量、面对生与死,每个人内心都震撼过。

社区拍摄不是新事物,我们参考国内外其它先导者的经验,与成都河流研究会及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共同讨论,产生了这个“灾民自拍社区故事”项目。我们希望通过灾民自我拍摄,用当地人的视角,记录农村社区重建的过程,展现重建中的力量和困难。同时,我们也期待和参与这项机构的机构,一同探讨如何透过社区拍摄,能更好地理解灾民对待自己社区,对重建社区文化等议题,进行深入思考。

执行项目过程中不无困难。如何透过社区拍摄推动社区组织?如何推动社区思考及重建社区文化?如何有效地进行多个机构、各方人员的交流?虽然如此,实施项目过程中点点滴滴的也听到一些正面的故事:社区放影后个别家庭关注到外出打工对留守老年人带来的影响,因而回家陪伴;社区学会了以拍摄来记录社区需求,并向政府表达……这些都是社区拍摄带来的无形效果。

我们撒下这颗小种子,期待未来与更多机构与个人共同分享尝试过程中的喜悦与成功。

在此,再次感谢曾经与我们努力尝试的伙伴们。





新的工作方法的尝试

高圭滋

四川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一个多月后,四川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从志愿服务阶段开始转向项目运作阶段。

在一次 NGO 举行的怎样协调资源和参与灾后重建的会议上,我谈到 512 中心没有项目资金、运作困难的情况后,香港社区伙伴的负责人周燕珍在大会发言,明确表示他们将会给予支持。听到这样的承诺,心中只有感激。

事过月余,香港社区伙伴成都办公室负责人何德贤先后多次来到 512 办公室,我们就项目资助进行协商和研究。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确定开展“灾区居民自拍社区故事”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探索社区影像作为一种社区工作的手法,通过地震灾区居民自我拍摄这种活动,体现社区重建过程中的力量,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参与意识,促进灾民和成员机构对于当地社区发展的思考,并促进参与机构和社区居民思考社区重建和文化重建,为社区影像作为手段推动社区互助、反思积累经验。五家参与机构是成都爱

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NGO 备灾中心以及茂县社区可持续发展促进会(现“协力品酿”)。

这个项目,对我们和参与机构来讲,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首先,在巨灾发生后的特殊条件下,在重建开始的时候,村民们面对许多共同的关注和公共议题。这些关注和议题,有可能促进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从而解决他们灾后面临的一些问题。村民自拍影像项目如何介入怎样给力,对我们和参与机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其次,在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几乎废置和无人问津的情况下,怎样有效地调动村民积极关注当地的公共议题,热情地参与到这些事务中,为村民自拍提供丰富的真实的生活素材。

再次,灾后农村社区公共议题众多,如何选择和确定,承担拍摄工作的村民怎样把握确定的主题焦点,围绕议题不跑偏,通过影像把一个主题或一个故事说清楚,拍出叙事完整并有一定感染力的影片。

最后,影像拍摄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摄像机的操作不算复杂,但拍什么、怎么拍、镜头运用、节奏把握等,却非旦夕间可以了解;特别是剪辑,需要熟练使用电脑等硬件和相关软件,蒙太奇镜头组合,技术难度更加了得。总之,拍摄计划的构思和执行、软件和学习运用、直到影片最后成形定稿,步步都要突破技术关。

此外,项目的组织实施、实施机构的管理构架、机构和人员间的团队磨合及沟通协调、培训的设计和开展、工作坊和阶段总结中的权衡研讨,其辛苦和操劳贯穿整个项目进程。

今天,项目的成果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看到,既有让人欣喜的成绩,也有令人遗憾的不足。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投入了很多很多,我们收获的经验教训同样很多很多。因此,我们参与项目的所有成员,能力都增长了许多,我们内心都有一份喜悦和骄傲。

遥想十年以前,参与式方法就发展到强调可视性的阶段,但是,直到今天,可视性的运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个项目的实践,必能促进在这个方面的发展。2011年3月下旬,在昆明将举行“云之南社区居民自拍影片展播”和系列工作坊及研讨会,是又一次学习和交流的大好机会。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社区居民自拍,会有长足的发展,参与式的方法将更加丰富多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劳动光荣,公益快乐。

明天,星空灿烂。

总论.....



剖想参与式社区拍摄

田 犁

社区建设有很多目标和方法。从方法上讲,目前运用最多的就是社区参与式方法。社区伙伴四川办公室从2008年底,在四川开展一系列名叫“参与式社区拍摄”的活动,尝试从实践中探索一种能够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从而推动社区建设的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期望在社区推动文化反思,或者期望推动社区参与推动社区建设等工作。

影像与社区工作

影像作为社区工作或者研究的工具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例如在影像工作中还专门衍生出了一种影像人类学等。在中国,也有不少机构和研究者作过很多这样的实践,例如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推动的“社区之眼”项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乡村之眼”活动,云南的社区影像教育项目,以及吴文光的“村民影像计划”等。

观察和分析这些实践,它们的共同关注点都是把影像作为争夺话语权的工具,关注更多的是村民通过影像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主流社会或文化对话语权的垄断。这些探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谁拍,拍谁,给谁看。

这些活动和项目也更多强调的是社区自己的人来拍摄,拍摄他们自己的生活,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然而,由于技术门槛的限制,社区还比较难以驾驭影像的拍摄、编辑和编导等环节,在实践中,社区在其中的角色往往变成了素材的提供者,一些机构和研究者主导了最后表达的观点,主流社会变成这些影像最后的受众。摄影机在社区也往往只被少数社区精英掌握和控制,这些社区素材也往往只是少数社区精英的个人视角。

社区参与式拍摄所期望的是,通过社区影像推动社区组织和社区文化建设。显然,上述实践的目的和指向与之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这里谈论的社区影像本身是一种社区建设的工作方法,它的目标、方法、过程跟前述的活动有很大差异。简言之,同样是

这三个问题,谁拍,拍谁,给谁看;在我们所指的社区参与式拍摄中,就是社区拍,拍社区,给社区自己看。

但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社区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而不是说某个或几个社区的人来拍摄就算是社区拍了。藤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是这样描述的:“社区就是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关于社区有多种定义,但都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社区是一个群体,在我们讨论社区的时候,通常强调的是这个群体,而不是指这个群体中的某几个个体。

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拍社区,并不是说只要是拍摄社区里的事情就是拍社区了,而是指社区共同关注的公共话题。给社区自己看,并不是把社区群众当观众就行了,而是通过定主题、拍摄、编辑影像,以及在社区放映,引发社区的讨论和思考,推动社区的参与,不断反馈公共关注的话题,看片只是形成讨论的平台,而最关键的是怎么协调社区的参与和讨论。

参与式社区拍摄

香港社区伙伴在 2008 年底开始在四川推动社区参与式拍摄的实践。2008 年 512 汶川大地震后,四川很多地区都面对灾后重建的艰巨挑战。重建不仅是基础设施的重建,同时也是社区组织管理以及社区文化的重建。结合过去已有的一些项目和社区的潜在需求,社区伙伴首先尝试在小金县和珙县一个农村社区和一个乡镇社区,开展社区参与式拍摄项目。与此同时,又支持四川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下称 512 中心)推动项目伙伴在五个乡村社区开展社区拍摄。

2009 年,社区拍摄项目通过中期评估,结果令人鼓舞。有些村民拍摄者拿起了摄影机,拍出社区的声音,并引起更多对社区的讨论;有的村民把拍摄结合当地社区组织工作,加强了村民对社区文化的关怀等。当然,在项目操作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和困惑,比如一些参与项目的社区缺乏积极性,社区拍摄呈现走精英拍摄的老路,社区参与不够,并不能发现和抓住公共话题,也无法引发社区的讨论与反思;参与项目的机构对社区拍摄理解不足,社区工作推动乏力等等。综合在不同项目点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它们为社区参与式拍摄促成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思考,让项目在梳理这些得失和累积经验上得以更上一层楼。

这些案例和经验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完善社区参与式拍摄的理念、方法和配套的项目设计和管理诸方面。

参与式社区拍摄的基本假设

影像在其诞生一开始就是资料保存、信息交流和观念表达的工具,一个好的影像作品确实有很强烈的推动文化反思的作用。在文化领域,影像通常是艺术家展示个人才华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有效工具。然而,它能否成为社区群体参与和使用的工具吗?如果能,还需要有什么配套或辅助因素?社区反思和参与的效果是否自然而然的出现?是否什么样的社区都能用这样的工具和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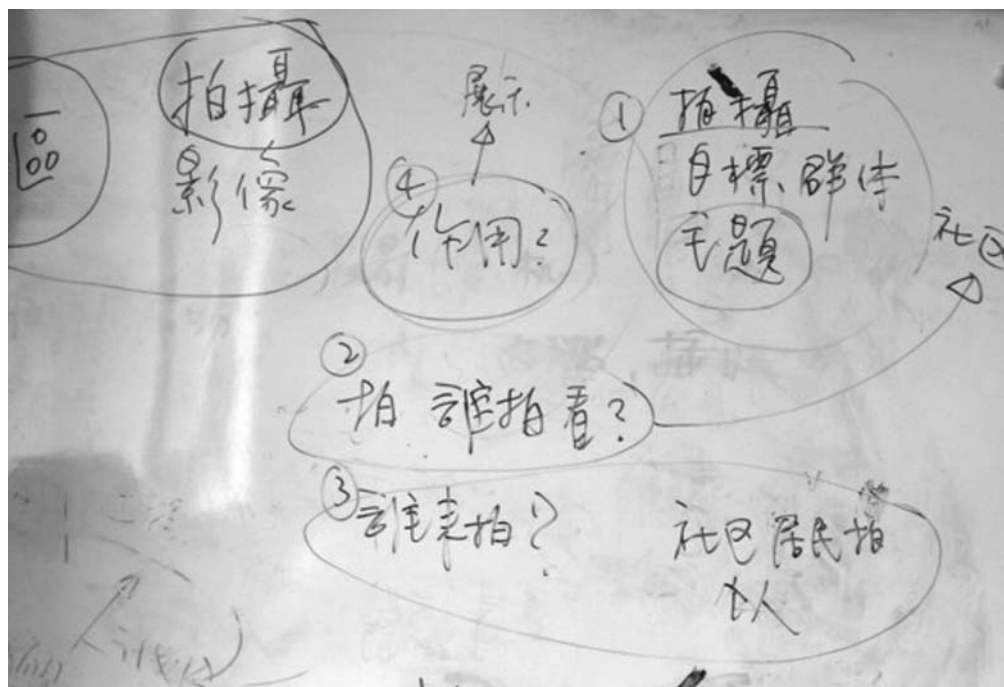
要回答这些基本问题,我们需要从影像的特点和社区两方面来探讨一下。

从影像说起

首先,影像语言可以提供新的和另类的信息和视角。

影像语言的基础是镜头,镜头不同于人的肉眼观察。当社区透过镜头去看自己周边熟悉的事物和环境时,镜头呈现的内容和效果,都将与平时社区个体看到的有所差异,这源于镜头的景别、角度等。比如,特写镜头滤掉了很多环境因素,让人强制关注到某个大家平时都忽视的点上;另类镜头则会呈现出社区事务完全不同的方面,甚至是完全看不到的事实;重复镜头就会反复强调和强化某些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一闪而过,不为人所察觉。

与此同时,影像本身其实是一种受限制的视角,它本来就具有强迫关注的特性。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发生的背景和环境,而且有很多事情会同时发生,很多不



同的事务在不同的时空同时地发生改变。而影像最终呈现出来的,不可避免地都是经过拍摄者筛选过的内容,都经过编辑者删减处理过,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带着拍摄者和编辑者的角度和思考。

其次,影像改变了观察的主体和客体。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肉眼决定了人只能看到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大多数时候每个个体都是观察的主体。在影像中,人可能完全地看到自己,自己变成了被观察的客体,促成人的关注点和想法的改变,就好像人站在镜子前,会对自己的外貌和穿着变得挑剔一样。尤其是当这种观察是放在一个开放的社区公众场合的时候,主客体的改变会带来社区心理上更深的变化。

由此可见,影像语言本身就具备促成社区用新的角度和方式,观察自己生活的功能,它可能成为促进社区反思的工具。

此外,影像的形成以及产品制作过程,都为社区提供了参与的空间和可能。

影像的产生需要经过至少三个过程:编导(包含主题的选择)、拍摄和编辑。在这三个过程中,哪怕是表达个体观点的先锋电影,也很难有某个个人就完全独立操作全部过程的,个中往往有群体协作,这个过程为社区提供了充分的参与空间。

编导阶段是要决定拍什么、怎么拍、怎么讲故事、表达什么看法等,这些都可以通过一个群体讨论来决定。拍摄过程,谁来拍,怎么拍,各种相关工作如何分工协调,拍摄者跟被拍摄对象如何沟通协调等,也需要一个相关群体来共同讨论决定。进入编辑阶段时,镜头怎么组接、如何取舍等,也都可以由一个群体讨论来确定。

再者,影像的播映本身就可以成为公众事件,成为社区讨论和参与的平台。影像必须通过放映,与观众见面,才能实现交流和表达的价值。影像的播放能够通过聚集群体的播放方式,形成群体聚集的场合和发表评论的平台,甚至可以演变为引发讨论和反思的社区会议。

最后,由于摄影机的引入,社区内部必然会形成新的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至少会产



田犳在做社区拍摄培训

生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这样的新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另一些新的互动话题和互动关系,亦可能会在人群中产生。

综上所述,影像本质上具备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的功能和可能性,可以成为社区工作的工具。

到走入社区

影像所具备的功能,可以达成社区参与式拍摄的目标。但要让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要看社区本身的特点,以及外部的项目支持。做一个比方,参与式社区拍摄要开花结果,那么社区拍摄只是一颗种子;社区本身的条件和状况是土壤;与社区拍摄相配套的技术培训、项目支持等就像是阳光和空气。要让这颗种子发芽,需要这三者的条件同时具备。

社区要有肥沃的土壤,让参与和反思可以出现,这是社区建设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参与就是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要促进社区参与,就需要有社区共同关注的公共事务,例如出现了跟社区生活攸关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的管理、利用和分配等事务,就成为社区参与和思考的诱因和前提。

在一个社区内部,影响参与式社区拍摄方法产生效果的,还有其他一些要素:

- 1、社区的骨干和领袖人物;
- 2、社区的文化传统;
- 3、社区的自我管理组织规则和方式;
- 4、清晰明确的公共关注话题;
- 5、个体对社区拍摄的兴趣和学习能力。

这些要素在社区伙伴和 512 中心的项目经验中,都有不同层次的展示。

除了肥沃的土壤,还需要适当的阳光空气,那就是社区拍摄培训和项目支持,才能成就社区参与和反思。

从项目的角度看,参与式社区拍摄培训该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社区工作,如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社区工作方法、社区会议协调人等的培训。这些都是社区工作的基础,为大家所熟知,因此不在这里作重点讨论。其次就是拍摄技术培训,包括摄影机的使用,镜头语言,编导和编辑等的基本知识。

由于生活方式和文化发展的差异,社区居民对学习和掌握摄影机方面,不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那么容易和得心应手,在使用摄影机时,往往会面临更多困难,就好像要让一个老农用英语去讲故事一样,由于受到这个交流工具的限制,要表达的事情,可能被扭曲或误解。所以,培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老农尽可能掌握实用的日常英语,

能够比较确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理想的社区摄影培训所采用的方法是既简单又快捷,让社区拍摄者能够迅速掌握拍摄的要点,让这个工具能够为他们所用,而不是被摄影机拖着走。同时,让他们在拍摄中感受到拍摄的乐趣和表达的愉悦。事实证明,这些简单快捷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很多社区学员都在简短的培训之后掌握了拍摄的规律,潜藏在他们身上的天赋被激发出来,拍摄出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员的作品来。四川小金县和尚村拍摄的几个练习作品就让人叹为观止。

社区拍摄本身是一种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的社区工作工具。因此,单纯为拍摄而拍摄的影像项目并不是社区拍摄的目标,这样的影像项目也缺乏长期持续下去的内部动力。因此,社区拍摄这种工具要真正在社区发生作用,就需要项目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表现为几个方面:

1、社区本身有项目,可以将社区拍摄设计成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工具:就是需要外部机构作为协作者,为社区拍摄提供协调、组织和推动。这种支持可能是一些硬件的支持,比如提供编辑用的电脑,也可能是技术性支持,比如帮助社区完成电脑上的编辑等难度较大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外部的协调和推动力,在组织社区开展项目活动的同时不断地把社区拍摄推向深入。

社区伙伴在小金县和尚村开展项目活动,项目协作者王成不断参与到社区拍摄的事情中,帮助社区编辑等,都是很好的外部项目的推动。

2、社区内部有需求,需要依靠参与式拍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是摄影工具真正为社区所用,这可能是最佳的方式。在 512 中心的项目中,茂县岩窝村的羌族原生态文化保护协会想要保存羌族传统的歌舞和生产生活方式等,他们把摄影机作为一个重要的留取资料的手段。羌文化保护成为一个项目,因此社区拍摄效果就非常突出。

3、社区拍摄本身成为一个社区参与式建设的项目,如是,在社区拍摄之外,项目设计和安排恰当的配套活动,保证社区拍摄最终达到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的效果:社区参与是要推动社区个体,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如果没有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就无法谈社区参与。在没有外部项目推动或者社区内部需求的情况下,想要达到促进社区参与的目的,可以依靠摄影机创造公共事务,将摄影机及相关硬件交给社区作为社区的公共资源,从而推动影像拍摄成为一个公共事务。当摄影机是社区共有的,那么谁保管,怎么借用,如果使用有冲突怎么协调等一系列公共事务,就被创造出来,再加上适当的社区协作,社区拍摄就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推动社区参与和反思的项目。

社区反思是要将一些新的视角、观点和经验引入社区,最终改变社区的意识 and 行

为。如果有恰当的项目设计,社区拍摄是有可能触发一些公共话题,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512 中心在广汉滴水村的社区拍摄实践就是很好的例子,拍摄者罗大述一个人拿着摄影机孤独地拍摄,但由于他选取的农村留守老人这题材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影片播放将村民平时视而不见的事实强烈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引发了社区思考。

快乐的参与和反思

在社区拍摄项目的设计中除了要考虑上面所述的这些因素外,还需要根据社区对摄影机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的需求来进行设计。不能指望把摄影机交给社区,马上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能你会为一些事情困惑:“摄影机应该拿来拍社区反思,怎么拿去拍喝喜酒……”其实当我们了解社区拍摄的一些规律,这样的困惑是没有必要的。

通常大家对摄影机都有几个层次的需求,首先是娱乐和实用性的需求,之后才是表达的需求。比如家庭录像就是最普遍的娱乐需求,这也是许多人买摄影机的最重要动因;有人拿了摄影机会去留取资料,比如珙县的老大爷就建议说,应该给大家拍些红白喜事;再走下去才是表达的需要,比如小金县和尚村拍摄的《王向兵接娃娃》就是要引发出一个思考:未来修路时该怎么避免破坏沿途的植被。

当社区拿到摄影机的时候,他们的需求和兴趣,往往会沿着这个规律,从简到繁逐渐发展。因此,在设计社区影像项目时,要在相应的时间阶段,顺应这个规律,避免板着脸做项目。

社区拍摄能够成为一种推进社区参与和反思的社区工作方法,有赖影像本身的特性,同时也要基于社区本身的特点,以及恰当的项目推动;这三者共同作用,才能保证这种方法可以取得相应效果。

而在社区拍摄的过程中,则应该注意三个重要环节:一是社区培训,让社区内部长出操作摄影机和操作社区拍摄项目的能力;其次是外部协调,提供社区拍摄的外部推动力;最后是相应的项目支持。这三者往往是使用社区拍摄工具的机构能够掌握的,需要在项目设计阶段予以充分考虑。

在众多的社区工作方法中,社区拍摄有其弱点,它与社区个体的利益关系比较弱和间接,因此在社区动员等方面效果会比较弱比较慢。但这也是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会成为一个强烈介入社区的工具体,不会导致社区内部太大的利益冲突,能够实现快乐的参与和反思。

当村里有了 摄影机



讲述耳朵的故事

肖志欣

什邡市湔氐镇桐林村

“今天是2009年10月11日，接连下了几天的小雨，天气突然转冷。终于天没有再下雨，于是乎我们就挽起袖子投入到劳动中去了。这么一大堆木耳废渣，只有靠着我们的好伙计——三轮车帮着搬运到实验地点。我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劳动的过程，在拍摄过程中有人向我提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木耳废渣解决难、木耳产量低、销售价格低，他们将希望寄托我们的身上，希望我们能尽快解决烦恼他们一辈子的木耳菌渣问题。我又何尝不想呢？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在三轮车来来回回跑了40多趟以后，我们终于将木耳废渣搬运完毕。虽然很累但很开心，接下来就是我该努力实施项目的时候了，加油呵呵呵呵……”

晚上，劳动了一整天的张杨在电脑前写下这篇日志，放在什邡龙飞菌业合作社的网易博客上。

22岁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张杨是这个合作社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他就出生在这个被誉为“全国黄背木耳之乡”的什邡市湔氐镇桐林村。村庄因长了耳朵变得富裕繁盛，人们不必外出打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也因耳朵疯长造成环境污染而失去了透明的空气、清澈的河流。全村每年产生的两万吨2000多万袋木耳废渣，给交通和排灌带来严重影响。村民习惯性把菌渣倒进河流或者焚烧：整个河道都是被菌渣污染的河水，“每年掏冤枉沟不晓得好多钱”；每到收木耳时节，田间焚烧让村子烟雾漫天，“连一盆干净的洗脸水都没得”。近些年，桐林村已经有人开始疑问：长了耳朵，就能拥有幸福？2008年一场地震让村庄瞬间失去了美丽的耳朵，如何找回带来富裕繁盛的耳朵？到底怎样的耳朵才能带来幸福与可持续的生活？在震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杨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下这一切，把桐林村的困扰、反思与探索呈现出来。

拿起摄像机

2008年512汶川地震之后，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下称512中心）开展“灾民自拍社区故事”项目。成都爱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下称爱白）是五个参与项目的民

间组织之一,爱白灾后第一时间就投入救灾,在心理援助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投入力量最多的项目点就是桐林村。

桐林村依傍龙门山系,紧靠绵竹,全村有 1,260 户,其中 768 户种植木耳,全村共种植木耳 2,700 万袋,人均收入达到 4,300 元,主要经济收入就来自木耳种植。2008 年大地震给桐林村带来沉重的打击,大量农房、木耳大棚倒塌,抢收来的木耳又遭收购贩子趁机压价,收入濒临绝境。爱白是最早进入桐林村开展援助的民间机构,不仅做心理援助、建立木耳图书室,还派出志愿者下地帮农民整理倒塌和倾斜的木耳架子、采摘木耳,积极联系买主,帮农民推销木耳。

在 512 中心找到爱白负责人雷刚谈社区拍摄项目时,雷刚迅速抓住了社区影像的四个要点:村民忠实记录、促进村民参与、锻炼村民能力和拓展视野、促进本地民间组织的发育和发展。雷刚觉得社区拍摄是个很好的机会,让当地人去记录和发掘民间故事,推动社区发展和反思。

在开展救灾工作之初,爱白就确定下工作方向:做机构擅长的心理援助,同时发现和培养当地人,支持他们建立起当地组织后,爱白就会从一线服务转为支持性工作,最后离开。在桐林村,爱白的工作策略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刚遇到了张杨。中学时代的张杨就喜欢看风云人物传记,那时他就有创办企业的理想。2007 年高中毕业以后,张杨到成都做销售。2008 年大地震以后,张杨回家在村委会工作。爱白最初来到桐林村的时候,村委会派张杨去协调工作。张杨就这么认识了雷刚,第一次接触到 NGO 并最终拿起了摄像机。

最初的迷茫

开始时,雷刚请爱白志愿者 Koco 担任拍摄项目的协作者。Koco 并不了解社区拍摄,他采取了放任的做法,“他们爱拍什么就拍什么吧”。当时,爱白在桐林村的援助项目已结束,机构跟社区的联系很弱,支持力度也不够。

张杨只好独自上路摸索,到底拍什么,这让张杨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初,张杨想到拍村里一只脚高位截肢的陈伯。陈伯 40 多岁没有成家,每天骑着三轮车拾荒、收破烂,还照顾几个兄弟都不管的老父亲。选择这个题材,张杨带有批判现实的思考在里头。“地震过后政府很快就发钱了,不干活政府也给发钱,还有灾区里外来志愿者给当地人发救济金。打牌要打的大,吃要吃的好,外面东西要买得好。有钱呢,反正这个钱是不用劳动得来的,暴发户相当于。”张杨觉得陈伯自力更生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就以陈伯故事为主线,通过拍摄陈伯的日常生活、拾荒供养年迈老父等细节,来展现残疾人自强

不息的精神。

拍完之后,项目组否定了这一题材。512 项目组访点报告里写到,“在题材方面,项目组通过部分村民观片的反映,感觉到大家对陈伯的故事已经习以为常,无法引起共鸣,再加上将边缘人介绍给社区需要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准,所以拍摄难度较大,建议更换为更接近社区重建主旨的题材。”这对张杨是个不小的打击,他觉得项目组没把拍摄目标说清楚,只好自己开始琢磨:为什么要拍?什么是更符合项目要求的拍摄题材?

带着最初的迷茫,张杨在拍摄和参访学习过程中,逐渐对社区拍摄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2009 年春分,Koco、张杨跟社区伙伴的邹乔一起去昆明参加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云南之行不但启发了张杨更多的拍摄灵感,也让他意识到拍摄能够产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力量。看“云之南”社区影像展,张杨感受到“摄像机最大的力量就是拍了一些不能曝的——村子里很普遍但是新闻里不能曝的现状,还有风俗文化保护这一块。“云之南”里有一个反应当地水污染情况的片子,寄到中央以后温家宝亲自批示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进步啊。”

带着记录真实和用影像推动社区问题解决的意识,张杨再次开始了他的拍摄与探索。拍摄的素材紧紧围绕着灾后重建:两个小女孩对于地震的记忆、清理废墟、孩子在工地旁玩泥沙、上新房、村委会开会、村民开大会、老人祝生、婚礼、春耕、成立合作社、合作社参加 2009 公益京交会等。张杨感到拍曹大爷 70 岁生日很有意义,“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照过相呢”。2010 年春节,张杨给每户人家拍了一幅全家福,不单村民喜欢,这种村庄档案式的全景记录也颇有价值,与此同时,这也让影像这种形式走近了村民。

拨开云雾

2009 年 2 月,张杨发起成立什邡龙飞鹳



业合作社,爱白的角色开始往协作、支持的方向上转。2009年3月末,爱白主动提出退出项目,让合作社成为拍摄项目什邡项目点的协作机构。善于沟通协作又有传媒专业背景的陈东接替 Koco 担任协作者,他的角色是跟张杨和村民一起讨论选题、剪辑片子、主持社区展播和撰写项目报告。爱白助人自助的定位,把更多思考和行动空间留给了张杨和村民。

2009年7、8月间,陈东帮助张杨根据前一段时期拍摄的素材,编辑成第一期片子《我的村子 2008-2009》,展现桐林村灾后重建的变化。8月25日,社区拍摄项目组在张杨家的院子里举行看片会。这是社区第一次看片会,拍摄项目的中期评估也同时进行。“拍摄过程缺乏计划性,话题的选择、拍摄过程都由张杨独立完成,缺乏社区参与;拍摄

之后也很少能对社区进行反馈。拍摄者感觉孤军奋战得不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不知道该如何推动项目;机构协作者不清楚社区的情况,无法提供相应支持更不能推动项目进展。”项目顾问田犁老师在中期评估报告中如此写道。

那天,约有50村民参与,社区拍摄第一次引起村民的集体关注。看片会后大家对于拍片选题各抒己见:田锦建议拍摄孩子们在自然中的生活,引起人们对教育问题的重视;余德成希望拍摄木耳废料菌渣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让更多人来关注和讨论;项目组建议张杨结合合作社在菌渣处



张杨(右一)在组织2009年8月桐林村的社区放映

理方面的探索进行拍摄。讨论话题不断深入,从希望拍什么片子转到社区需要做什么事上,产生了不少公共话题,比如社区重建各家都贷款,没有新的产业几年以后怎么办;大家都沉迷于打麻将,以后的出路在哪里;村里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文化中心等。拍摄也变得要为社区的发展服务,比如怎么拍出一个反应当地木耳产业和未来旅游发展的宣传片,为村子经济发展助力。社区对影像的关注,逐渐转到了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发展的讨论上。一些社区居民提出了自己希望拍摄片子,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拍摄者。

【注1】

社区展播带来的群体活动以及田老师的点拨给了张杨很大鼓励,经过长时间的迷茫后,张杨慢慢醒过神来,觉得不能拍完片就完了,应该让它影响到社区,通过社区拍摄,让村里人意识到村里面临的问题,并自己想办法解决。社区展播也激起了协作者陈东的兴趣,愿意更多投入社区工作。

2009年8月,成都城乡社区NPO发展中心向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申请到“桐林村木耳菌渣再生循环项目”小额资助,支持龙飞菌业合作社开展变废为宝的尝试。拍片和合作社事务的推展并肩前行,相得益彰:龙飞菌业合作社获得更多资源成为拍摄项目的协作机构,让拍摄者有机会得到更多锻炼成长;项目组开展评估和展播做了一次社区参与的示范;桐林村获得木耳菌渣再生循环处理小额资助,让关注菌渣污染治理的讨论得以落实到行动层面……这种种发展都给社区拍摄带来良好契机,让社区拍摄有可能作为一种社区工作手法,去推动社区参与和反思、促进社区的建设。



2009年8月社区拍摄项目中期评估(桐林村)

社区参与和反思

每次开拍前,陈东都会组织一个小沙龙来讨论拍摄主题,每次都有五六个人参加。“都是他们自己琢磨看拍什么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看哪个主题比较好。定下来之后再来看形式,准备要拍哪些东西。有个讨论的过程来确定拍什么。比较正式的有三次,中途

我跟张杨、邹茜讨论的数不胜数,都是打电话聊这些事情。”从前期张杨独自决定拍摄内容,到小组参与讨论选题,社区参与慢慢有所扩展。

在桐林村这个地震前比较富裕的村庄,看到DV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不过大部分人还是第一次面对摄像机。人们有着不同的反应:小姑娘面对镜头接受采访觉得新鲜好玩,讲述地震感受时也一直在笑;年轻姑娘非常害羞的说“不要拍我,丑的很”;也有女人忸怩担心“你把我拍得不苗条不漂亮”;有些男人爱开玩笑“我不适合上镜,我长的多帅的,你把我拍得丑”;有人面对镜头,落落大方的接受采访,算上一笔搭建耳棚的经济账;有人对摄像机视而不见只顾忙自己的活路,张杨拍清理废墟的劳动场景时请人们发表几句感想,人们闷声不语用斗车拉走瓦砾,留下张杨采访无人应答的尴尬空白和两个扭头就走的背影;拍摄施工现场的时候,画外音里有人严厉质问:“你是谁,干什么的”,张杨连连解释是本村人,拍点东西。

除了张杨,其他村民还是“被拍摄对象”。摄像机在不同人当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这取决于人们的年龄、性别、兴趣和身份:小孩子天真烂漫对镜头充满好奇,年轻姑娘害羞躲着镜头,忙于活路的中年人常常没工夫理会这些事,施工现场的人非常警惕镜头对准他们,这些人没有成为拍摄和创作主体,不过和摄像机算是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在张杨忙不过来的时候,女朋友邹茜帮忙拍,此外,就没有更多人成为拍摄者。张杨感到独自拍摄力量孤单,“应该培养更多拍摄者,让更多人来拍。”张杨的角色意识还没有转过来,他忽略了自己不仅是拍摄者,也是协作拍摄的负责人,具备能力和资源培养更多拍摄者,自己可以也应该扮演源头和推动者的角色。

张杨和邹茜拍摄了搭菌棚、打包装耳子等,把菌渣产生和污染状况完整呈现了出



桐林村社区放映讨论会

来。2009年9月到11月,张杨历时三个月完成“木耳废渣有机堆肥”全过程,把木耳菌渣拌上菜饼、鸡粪发酵制作成有机肥,免费发放给村民还田,并且首次用摄像机记录了桐林村在生态处理木耳废渣方面的努力与探索。2010年开春,施用有机肥的麦田长势茁壮,实验成功。张杨又拍下这些,最后剪辑成《我们村的黄背木耳》。“通过我拍片子,老百姓看到其实这个菌渣可以变成财富,他们自己也会去想办法,不用我一个人去想办法。哪怕我现在没做好,也会有人开始做了。”

2010年3月桐林村展播会放映《我们村的黄背木耳》,有40多人看片。菌渣污染带来的困境和每个家庭息息相关,以影像方式呈现出来引发了村民的集体讨论。不过面对困境,村民的讨论更多表达出无力和依赖,村民普遍认为仅仅在村子里放映影响范围太小,如果扩大影响范围,引起“上面”关注才有可能解决菌渣污染问题,不可能凭借自身力量解决。还有人寄望于“外面”,希望社区拍摄项目组能够帮助解决菌渣污染。2010年3月4日,四川卫视公共频道《直播四川》播出了《种植食用菌别忘了环保》的新闻报道,新闻画面多数来自张杨和邹茜的拍摄,媒体报道确实起到了引发更多关注的作用。社区影像作为一种发声渠道来创造对话、促进思考、凝聚共识,这些功能在桐林村得以实现。

桐林村的菌渣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很多村民对此早有关切和反思。于从正在十年前就关注木耳菌渣带来的污染问题。“种耳子只顾眼前利益,没考虑后头问题。眼前创造了一定财富,长远看是自己扼杀自己。污染挡住了招商引资,现在种耳子亏本的多了,锯末子贵得很,赚不到好多,要养活子孙后代不可能的。”十年前于从正给过乡政府一本资料,讲怎么用菌渣制木炭。他很想做,但是缺乏政府场地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而没有做成。对于张杨的拍摄,



桐林村协作者陈东

于从正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村民们对自己身边的影像不感兴趣,很可能是一份无能为力的表现,不愿通过影像再现的方式重复展现自己的这种无力与悲哀。可能这就是人们不愿更多参与和反思的原因吧。展播环节,很多人出于“看着好耍”来参加,但也因如此,人群



2010年4月桐林村社区放映

暂时的聚集营造了一个集体表达的空间。在日常生活里，个人在独自面对环境污染这类的公共议题时，会有一份更大的无力感。

社区土壤

像大部分中国农村一样，桐林村公共事务荒芜，社区组织化程度很低。震后两年的桐林村除了修好漂亮的房子，村庄公共事务和震前没有两样：道路坑坑洼洼、排水沟里垃圾堵塞、水井没打、化粪池没修、除了麻将馆外，没有公共活动空间。比震前更糟的是很多村民连自扫门前雪也不愿意了，坐等政府来清理环境。村上的小组长【注2】认为“这些事应该是政府无偿提供的”。面对政府的不作为，小组长毫无办法，也不想带村民一起做：“生产队如果喊社员弄好了，完了政府又来弄不就花些冤枉钱？”就这样村庄公共事务的建设一拖再拖。

经历过地震的村民看淡生死，“想开了”，不再为房前屋后的一点儿地方争执，“该吃吃，该耍耍”，打麻将的比以前多很多。村里唯一的公共空间是几个麻将馆，打麻将也是除看电视以外唯一的消遣娱乐。很多人家下午都闭门，聚到麻将馆打麻将。张杨家里就开着一个麻将馆，他对此感受更深，又看到村民为评低保争执不下，“大家觉得这钱你不应该拿，你那么懒，每天去打牌，为什么给你啊？想的有道理啊。我们这里谁穷啊？没人穷，懒。现在我归结，穷人只有一种，因病致穷，那是真的，其余的都是懒。”80后村庄精英张杨，对弥漫整个村庄的消极懒散情绪，有种恨铁不成钢的责备。村民周乐芬却不这样想，她说自己打麻将并不是出于懒，仅仅因为实在找不到事情做。“这里比较闭

塞,每天就接触木耳、麻将,我不想打,不是沉溺于麻将,是没别的事可做,无聊透顶了。打麻将要输钱的嘛,我想找点啥事做,加工、编织、绣都可以,管它赚多赚少。这些好事就是没人带头。”

公共事业荒芜,一方面由于政府不作为,另一方面在于社区组织的缺乏。除了村委会和一个妇女腰鼓队,地震以前村里就没有其他的村民组织了。村委会名义上是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上仅仅完成镇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妇女主任组织了妇女腰鼓队,以前常常在夏天傍晚打腰鼓,地震后也解散了。地震以后除张杨成立了龙飞菌业合作社以外,还成立过一个昙花一现的“业主委员会”。这个“业主委员会”名义上为监督房屋重建的施工质量而成立,实际上是拉起个幌子,堵住村民对施工建筑质量不满的嘴。“业主委员会”人员不是村民选举出来,而是组长喊的人,“喝酒吃饭,由施工方发工资”。2009年2月成立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开始有8个人,后来只剩3个,于从振开始是其中一员,“过于认真的要不得,我就自动退出了。”两个月以后“业主委员会”就解散了。

为什么村民自发的社区组织难以建立?一方面难在缺少好的带头人。不单是精英流失,完全用利益视角解释行动的村庄文化,也压抑这种带头人的出现。“你要出来带着这个头,人家说你得了多少好处。选出来也只有两三天热。”这种没有利益就没人做事的逻辑推断,压抑了很多人的公共参与和公益心,熟人社会的村庄里人言总是可畏,让想出来带头做事的心怀畏惧。名正言顺能够带头做事的人,只有村长和各个组的小组长。精英选拔的逆淘汰,让正直的人不屑于做村长和小组长,于从振说“喊我当队长我没干,乌得很,我看不惯。”而现有村干部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为啥干部喜欢搞统建?都想吃钱。自建自己买材料他吃不到好多钱。一塌糊涂现在这个社会,跟刘罗锅3那个年代差不多了。”另一难在缺乏公共资源:资源由政府垄断,导致民间缺乏参与的动力及空间。政府对资源的高度垄断造成了村民对政府的高度依赖,认为一切公共事务都是政府的责任。哪怕门前的垃圾自己去清理也是“便宜了政府”,因为“上头拨了钱让他们做这个”。

最美的收获

截至2010年5月,桐林村编辑成的片子有:《我的村子2008-2009》、《曹大爷的70大寿》、《我们结婚了》、《木耳废渣对环境的污染》、《我们村的黄背木耳》。社区拍摄这粒小小的种子在贫瘠的社区土壤里长出了稚嫩的幼芽。参访培训、外部协作和资源支持,这些阳光雨露呵护着幼芽的成长。待到幼芽长大,必将带来社区土壤的改善。

参与社区拍摄项目,让张杨有机会接触和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公益事业,

公益、合作、共生与可持续理念开始在这个青年人心里扎根,他的理想从创办企业变为创办一个社会企业。张杨已经开始在村子里践行合作发展的道路,目前他在积极联系福幼基金会,争取更多资源孵化社会企业,进一步探索解决菌渣污染的难题。拍摄项目虽然结束,张杨仍然希望继续拍下去,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悲观者希望,让无力者前行。张杨发现单独用影像做社区推动很困难,必须和项目结合;培训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拍摄技术方面,还需要有社区发展、参与式工作方法等内容。这个青年人的思考从社区拍摄起步,最终远远超越了拍摄本身。

张杨用摄像机所展示的,不单是桐林村地震一年多以来的变化,还有关于自身的成长记录。2009年底,张杨和邹茜结婚了。他们说是父母催婚,自己觉得还小,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婚礼是一个人的成年礼,特别是在农村,结婚意味着今后要在家庭和公共生活里担当起更大的责任。成家之后的张杨愿意更多学习和积极做事,也愿意沉潜,花更长时间来积累经验,带动村民一起发展。这是社区拍摄项目在桐林村最美的收获。

协作者的话

“社区拍摄第二阶段爱白退出后,自己作为协作者的角色变化带来的一些心理变化和思考,主要表现为从脱离社区到贴近社区。”

——爱白协作者陈东

“在大政府的背景下,民间组织在农村进行社区发展工作,首先应当注意赋权手法,推进社区民主治理。在这个项目上,主要是提供能力建设使拍摄者掌握社区工作技巧。通过资源转移,爱白退出,张杨的合作社成为协作机构,获得发展动力;进而通过赋权给项目点充分的自主,使个人和社区在自主工作中一起成长。

“这个项目也是村民通过拍摄这个公共事务去做社会动员的一个很好的尝试,改变了以前完全作为政府动员的客体的状况,在透过社会动员反映自己诉求方面有一个很好的萌芽。以后在选点上应当把社区村民的自我反思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应该挑选有能力的拍摄者。”

——爱白负责人雷刚

【注1】《社区影像项目中期评估报告》,田犁。

【注2】小组长相当于自然村村长。

【注3】刘罗锅,本名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是影视作品里“上镜率”最高的清代大臣之一。

山路

高雪松

小金县美沃乡和尚村

又是一个周六上午,王向兵和同村几个男人再次登上摩托车,下山去接在乡中心学校寄宿上学的娃娃们。每周都要一接一送,不只是自己的孩子,也要帮其他人家。

“这路硬是悬呀,山体滑下来了,连摩托车都不好走,底下是大沟,高头又是泥石流……”

好几处都要下摩托车推行,单程十多公里的路,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乡上的小学门口。

这几位父亲在学校接到孩子后,每人自己的摩托上驮上三个娃娃,驶向上山回家的路。摩托车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上行,遇到陡峭的山坡和被泥石流冲垮的路段,大人娃娃们都要下来徒步走一段。

“以前修路没有经验,破坏了植被,地震之后一下雨就泥石流、滑坡……”

“我们村上马上又要动工修路了,这回我们一定要把植被保护……(以后)接娃娃时我们也免得操心,免得安全受到影响”。

这是和尚村民拍摄的作品之一《接娃娃放学的路》,通过镜头画面和画外音向大家讲述的故事。

社区与拍摄结缘

和尚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美沃乡的一个小村子,50户人家散落在青藏高原东南缘邛崃山脉高山峡谷地区的深深高山上。接触过和尚村的人对这里都会有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这里山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二是和尚村村民纯朴开朗,漫溢着一种凝聚团结的自我认同感。

提起路,这可是和尚村的“重大关切”,位于高山上的和尚村过去一直没有一条方便的路,几代人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个现实。2006年,村里终于争取到政府的资金支持。

2007 年底,阴山上修成了一条 6.1 公里的通村路,这条山路带来盼望已久的便利,村民也似乎看到将来经济收入增加的可能。但仅仅过了半年,512 大地震突如其来,尽管没有造成和尚村的人员伤亡或房屋的重大损失,但地震后几场大雨,就把某些路段所在山体上的植被和山石冲塌,出现滑坡;路,断了。

与其它村庄相比,这里的村两委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关系比较融洽,村民对村两委的信任度高,抱怨少,原因是这里村治比较公开透明,几位村干部是村中能人,既起到带头作用,同时又处事公正,为大家利益着想,很努力地为村子的发展和生活,争取政府的扶贫项目资金支持,比如:修路、通水、试种草药、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农网改造等,2010 年还计划完成对全村房屋的村貌整治项目。【注 1】

和尚村这种良好的干群关系,以及村庄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也有着较长的传统。其中最好的例子还是修路:从最早山梁上唯一的靠人和牛马用脚踏出的路;到四十年前,在村中领袖带领下,老老少少手挖肩挑、家家户户投工投劳合力修的一条“毛毛路”;每年还要对这条路进行有效维修。如果村庄内部没有很好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和传统,没有人与人之间凝聚及和谐的互动关系,以上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社区伙伴在阿坝州小金县开展了多年的项目,512 地震后,回应小金县灾后重建的需求,香港社区伙伴走进了美沃乡和尚村。香港社区伙伴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灾后重建项目中,不希望只提供硬件重建或单纯提高经济生计,而希望促进社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行动。面对和尚村修路与生态破坏,外来的香港社区伙伴能跟这个村庄一起做些什么?

当时,香港社区伙伴正支持四川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下称 512 中心)开展“灾民自拍社区故事”的社区拍摄项目,工作人员于是想到,何不让和尚村也分享“社区拍摄”项目的培训和交流等资源,让村民把修路过程和对修路的思考用影像记录下来。一方面,拍的片子可以作为社区环境教育的案例和材料,另一方面,也能促进村民思考生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和尚村与拍摄结下缘分。

精干的社区拍摄小组

得知有这样的学习机会,而且要在村里拍摄,村干部就在村中动员有文化的年轻人参加,但由于当时大家对这件事不太理解、感觉陌生,无人答应,于是村干部就自己上阵了。和尚村的拍摄小组最后由五名从 20 岁至 40 岁的男性村民组成:村长王晴飞、队长杨国军、民兵排长王向兵、团支部书记杨全友和普通村民张世兴。村书记王向山虽然不在小组中,但对此事十分了解和支持,甚至有空时也会拿起摄像机拍一拍。这个村

子的权力核心和精英,从社区拍摄启动之初就参加到培训和活动组织与实践中,足见他们的开放性及对这件事的兴趣和支持。

2009年1月,和尚村的拍摄小组来到成都参加社区拍摄第一次培训。培训结束回家时,他们不仅初步掌握了拍摄的一些基础知识和技能,并带回一部家用数码摄像机,开始在村里实践了。接下来的一次村民大会上,村长王晴飞专门留出时间正式介绍参加社区拍摄培训的学习情况,向村民解释他所了解的“社区拍摄”:“……就是按照大家的意思来拍我们的生活,记录下来放给我们自己看,也拿到外面给人家看……”,村民

接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意见,讲自己认为应该拍的内容,从修路、种庄稼、到传统活动、唱歌跳舞等等,不一而足。

两个月后,和尚村的拍摄小组带着自己在村中拍摄的作业——《春耕》和《接娃娃放学的路》的素材,到成都参加第二次培训。这次,他们的表现和作品得到培训老师田犂高度评价,让拍摄小组对拍摄有更大信心。

2009年5月的第三次培训,团队从成都移师到和尚村。拍摄小组



2009年5月小金拍摄团队在学习剪辑

和村民在自己的村子里,与外来的培训老师、其他地方的拍摄者和协作者一起,经历了三天两晚的实地培训和实践活动,较完整地体验了社区拍摄在实践中的真实感觉,并即时共同制作和编辑完成了好几个作业——《虫草》、《山歌》、《阴山行》、《三人行》、《和尚村的电影梦》等。这次培训,可以说是社区拍摄活动在村子中的一次高潮。外来人员与村民在三天的活动中做了许多交流:白天一起话家常,一起聊希望拍什么,一起去山上挖虫草,晚上一起看白天拍的片子……,和尚村拍摄小组在最后一天还为下来的拍摄活动,特别是修路的事情定出行动计划。和尚沟的村民对这几天活动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到现在他们还能记得当时的很多人和趣事。

拍摄修路艰巨且长

前面提到的《接娃娃放学的路》,是在2009年即将开工重建村路之前拍摄制作的。其实,在摄像机尚未进入村子之前,村两委就曾经想过最好能把村路的情况拍下来,用于和上级政府沟通,争取资源帮助解决修路的问题。地震后的第二年,村里终于争取到了政府的灾后重建资金逾百万,重修村路。尽管上级政府这个决定并非是受到拍摄小组拍的素材或编成的片子的影响,但村里精英确实有这样的意识和想法。

普通村民与外来的香港社区伙伴都对拍摄这条路的重建很关心,村民们是希望拍下修路过程的艰难,让后辈了解村子的情况和前辈做出的努力,而香港社区伙伴则希望通过拍摄,促进村民反思修路、生态环境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接娃娃放学的路》这个片子的线索,就将村民的生活与路联系起来,从而希望能够导入对生态的关注。

究竟修路该怎么拍,村长王晴飞心里有挺清晰的想法:应从修路开始筹备时就拍摄,比如“村民因为路而受益,但修路要占用他们的一些土地,矛盾是怎样协调解决、达成一致的”、“挖毛路,崖子方量是多少”、“打堡坎,石头的来源,沙石是怎样运进的”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反映出修路的复杂和艰险的重要内容。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这些想到的思路并没有全部付诸实践。保留下来跟修路有关的镜头包括:开工剪彩仪式时的音乐和彩旗、村民聚集和等待、村里年轻人跳锅庄助兴、乡领导讲话、还有在小庙附近烧香、杀鸡祭祀、挖掘机开挖路边山体、村民在山体上钻孔等等;此外,也有采访村民对路的看法和这次修路的评价的镜头,其中采访的村民有老年人、妇女、壮年男子,也有村长自己蹲坐在路堡坎上的独白。

由于村务繁忙以及自家要盖房子的关系,村长王晴飞后半期几乎没有再拿起摄像机。少了这个灵魂人物的参与,加上其他几位拍摄小组的村干部成员也忙于村内各种工作,拍摄修路计划的推展变得异常困难。2010年夏天,村路基本上都重建好了,但所

有人都关心的“修路”影像,却没有被编辑成一部片子,还是以素材形式留在摄像机和电脑硬盘里。回顾这一年半的过程,几位拍摄者都表示虽然对拍摄很感兴趣,但“精力没有放够”,这一年村中重修道路和电杆等任务重工作忙,自家的生计活路又不能放手不管,如是,很难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拍摄工作上。

外来协作的波折

和尚村的社区拍摄,上半年进步最快,势头最好。随后一年,社区拍摄活动没有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究其原因,除了村里事务较多较忙外,外来机构香港社区伙伴没有很好地协作,也是一个主要问题。

和尚村社区拍摄的前半年,香港社区伙伴把主要的协作工作交给王成。1982年生的王成是小金本地人,2008年4月加入香港社区伙伴小金县办公室当全职志愿者,表现出很强的学习和协调能力。香港社区伙伴当时已在小金县驻点三年,负责推动项目的全职工作人员是1984年生的唐友德,小唐和王成搭档,使香港社区伙伴这个外来机构的理念和方法,与小金本土青年对当地的认知和思考得以结合。

和尚村是王成的老家,王成和拍摄小组几位成员从小认识,继承同一个文化历史。尽管王成后来外出求学、闯荡,但只要他回到和尚村,依然有着较强的动员能力,村民信服和喜欢这个有见识和思想的年轻人。王成能把外来的社区发展理论和手法,很好地结连村子的实际生活,用村民听得懂、听得有兴趣的方法说清。相比之下,外来协作者容易把事情讲得“书面化”。可以说,王成既是协作者,又是五人拍摄小组重要的编外成员,受到好评的《春耕》和《接娃娃放学的路》两个作品,都是在王成的参与和协作下完成的。

在和尚村进行第三次培训时,小唐因其它学习任务没有参加,培训成功达到效果,更是离不开王成的协调和协作。他就像外来人跟和尚沟本地人之间的一道粘合剂,让双方的沟通和交流达到最佳效果,大家都在当中收获了学习和快乐。遗憾的是,王成在圆满协作2009年5月和尚村第三次培训后,就结束了他一年的志愿者工作,离开了香港社区伙伴,并开始了在县司法部门的公务员新工作和新生活。

香港社区伙伴在2009年上半年增招全职工作人员,一方面处理地震后增加的工作【注2】,另一方面就是填补王成留下的空缺。新聘项目官员胡小平6月1日正式到职,专门负责推动香港社区伙伴在小金的灾后重建项目,跟进和协作和尚村的社区拍摄活动的责任,也从小唐转到小平身上。

前半年三次社区拍摄培训,是拍摄者从零起到掌握基本的拍摄知识和技巧的阶

段,较容易看到明显的进步。但在掌握了拍摄规律之后,如何协助拍摄者掌握和运用社区拍摄中的社区规律,让社区拍摄能为社区需求和问题服务,就成为了协作的重点和难点,小平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接手和尚村社区拍摄协作的挑战。

初来乍到的头几个月,小平需要着力学习、了解和适应香港社区伙伴在小金灾后重建项目的种种情况,但这个时期却恰好是和尚村社区拍摄培训高潮后的兴奋期,是推动社区反思和参与的最佳时刻。时间错配。小平坦承当时他并不明确自己在和尚村社区拍摄中的角色,以为自己只是配合香港社区伙伴负责社区拍摄项目的项目官员邹乔,协调小金这边的事务,后来才逐渐知道自己要承担起主要的协作工作。2010年初,社区拍摄项目进入中后期,对工作逐渐熟悉并已上手的小平,已经能够带领拍摄小组讨论拍摄计划,参与讨论内容、分工、编写旁白,编辑影片素材,以及协助村民做观片讨论等,比如《新桥乡文化节》就是小平协助拍摄小组成员张世兴完成的片子。

参与和收获

掌握了基本拍摄技巧的五人拍摄小组,起着带头作用。在和尚村,目前还没有其他村民加入拍摄小组,但男女老少都已经接受和习惯了摄像机在他们生活中存在:从最初村民面对摄像机的害羞和躲闪,到后来可以自如地面对摄像机讲话、做事,唱歌跳舞……。

对于和尚村村民来说,拍摄最直接是可以记录村里的重要事情,留下纪念:比如村中的红白喜事、民风民俗,村里的自然环境,日常生活等。从小小的摄像机进入村子开始至今,和尚村的拍摄小组陆续记录了不少素材:过春节跳锅庄、敬酒、舞狮子,开村民大会,春耕,修路,修电杆,结婚,乡中心小学开家长会,妇女们为“三八”节排练锅庄。拍摄小组也被附近其它村的亲戚朋友请去拍摄过婚礼,2010年3月他们还被香港社区伙伴请到小金县的新桥乡去拍摄文化节等活动。然而,由于村里没有电脑,编辑素材很不方便,在不同电脑转存和编辑的过程中,也不慎删除了一些重要素材。

对于自己拍的片子能和外面的朋友和专家交流,村长王晴飞感到格外骄傲。他对社区拍摄甚至有这样的想象:“通过我们村民自己拍的真实的片子,你们外来的机构香港社区伙伴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农村真实的情况,为农村争取好的政策。”

拍摄小组成员感觉参加“社区拍摄”,最主要的收获是学到了和影像编拍有关的知识和技术。王晴飞、张世兴和杨全友是小组中最积极实践的拍摄者,“以前只是觉得电视电影里的故事精彩好看,但现在知道为什么了,而且自己也可以拍一些故事。”说到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出的满足和得意。

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和尚村的拍摄小组经历了由最初对拍摄感到新鲜好奇，进而使用摄像机满足村中对影像的娱乐和记录的需求这两个阶段。小组和村民更从现实生活中，如行路难、野猪毁庄稼等问题，联想到怎样利用摄像机这个工具，拍出反映生活的素材，其中有些还剪辑成片，这些都让人感到欣慰。

尽管这次修路仍然不能避免地对自然环境造成一些破坏，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拍摄小组的成员已经考虑到采取补救措施：在路旁植树种草，尽量恢复生态，只有山体和植被稳固，路才能稳固，降低将来养护道路的成本。虽然 2010 年已经错过了植树种草的季节，村里会在明年的适当季节落实这项工作。

协作者的话

透过灾后重建项目，采用社区拍摄手法推动社区去关注和思考基础建设与当地环境、文化的关系，对其生活带来的变化。社区对自己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状态有自己的理解，社区拍摄提供多一个机会在社区内讨论和再梳理生活的含义。然而在项目操作过程中作为项目本身可以有很多期待，但社区也有自己的节奏和兴趣点，所以作为外部协作者如何看待项目的期待和自己角色需要多一些思考。正如该项目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社区拍摄在社区内带来的变化，哪怕只是较浅层面上的思考，但至少种子已经播下，开始发芽，这也是让人欣慰和激励的。

——香港社区伙伴协作者胡小平

【注 1】对房子进行一番嘉绒藏区建筑风格的美化。

【注 2】除了之前的常规项目外，香港社区伙伴在小金亲力操作的灾后重建项目覆盖四个乡镇七个村子 642 户农户，涉及的内容多元。

不变的快乐和无声的改变

马志勇 刘易平

茂县松坪沟乡岩窝村

春耕后,村民就开始为当地最重要的节日转山会忙碌起来。农历六月十九是转山会的正期,连续三天,村中几乎所有男女老少都参与其中。男人们宰杀牦牛,祭拜山神,妇女们手牵手,欢快地跳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一对新人喜结良缘。春节期间,村民相互拜年、舞龙、祈福消灾,期望来年平安幸福。冬去春来,季节流转。

影像戛然而止,荧屏漆黑,村民质朴愉快而略带忧伤的歌声却仍在荡漾…

这些歌声来自居于偏远的岩窝村羌民,刻录在他们自拍的电影《四季》里。



何天发(站)在主持岩窝村社区放映讨论



2009年8月岩窝村转山会男子下棋活动

当传统与现代握手

茂县松坪沟乡地处茂县与黑水、松潘三县接壤的高山谷地，因岷江支流松坪沟流经此地而得名。岩窝村在松坪沟最深处，这里森林繁茂，河水清澈，鸟语花香，是羌文化核心区域之一，当地羌民保存着完整的羌语和独特的多声部合唱。自古以来，这里的羌民靠山吃山，以放牧牛羊、采摘野菜、挖掘药材和简单农业为生。天神、山神、家神以及



其他一些自然神，庇佑他们的山林、家人、牛马羊群等牲畜。在自然环抱和神灵的保护下，人们过着简朴而快乐的生活。

随着近代政治社会的转变，特别是七十年代末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与城市化大潮逐渐冲刷到这偏远的羌寨子来。传统与现代握手，一点都不简单。个中传递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文化结构，以及他们所立足和承载的一整套思想和价值观。岩窝村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开始有所发展，少数敢于闯荡的村民走了出去，山村居民的现金收入逐渐增加。与国家整体状况一样，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往往会破坏在地的环境和文化生活：农村孩子的教育越来越与现实脱节，劳动力往外跑，农田撂荒，山林被肆意砍伐，水土严重流失，村民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前亲密的人际邻里关系开始疏远，传统村族文化习俗、伦理和社区组织逐渐衰落和瓦解，生活失去了往昔的快乐与和谐。

这里的老人家对转变感受最深，茂县松坪沟羌族原生态文化保护协会（下称羌文化协会）会长何天发（下称何叔）和几位创会成员对羌文化的保育和承传特别上心，一旦碰到羌文化的话题，何叔总会如数家珍地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什么什么，眼神闪亮，一口普通话带着浓重乡音，整个身体语言则毫无保留地诉说着他对老祖宗文化的热情和钟爱，还有他心里因传统日渐式微而产生的无奈和疼惜情怀。羌寨子里现在可以很容易找到说普通话的年轻人，也会碰到穿汉服的老人。就如何叔这般热爱传统文化的长者，也不再拒绝一些现代生活带来的方便，“我现在穿汉服，不太穿羌族大袍子了，还是汉族衣服方便。”他手机不离身，铃声是高亢的羌语歌声。至于一直

一直在村寨子里扮演大脑和总管脚色的男性长者们，在公共事务上的权威地位，也随着社会的转变，慢慢褪色。

进入二十一世纪，政府推出退耕还林，保护山林等政策。羌族文化也得到政策上的扶持，松坪沟的白石海就以其媲美九寨沟的美景受到游人青睐，被列为四川省级风景区，羌族的多声部合唱则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常在茂县各种文化旅游活动上展示。在岩窝村，部分老人积极组织羌民，传承和保护祖辈遗存下来的的文化精华。羌

文化协会就是何叔和何国友等 12 位岩窝村长者在 03 年筹办的一个民间组织，于 07 年正式注册。经多年苦心经营，协会定期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转山会活动，并以此为纽带，将多声部、羌语等特色文化传统与白石海自然风光旅游结合起来，为岩窝村打开一扇富羌族文化特色的旅游经济大门。

当羌寨与摄影机握手

2008 年四川地震，震央就在与松坪沟仅一县之隔的汶川。民间组织的救灾行动，很快进入偏远的羌族村寨。其中，原重庆万州社区文化发展促进会进入茂县后，迅速成立了茂县社区可持续发展促进会（下称促进会）。负责人陆伟以前在重庆万州做社区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促进会成立后，继续上述两个领域的活动。08 年底，促进会组织捐助首批越冬物资到岩窝村，因而与羌文化协会建立联系。不久，促进会得到世界银行和南都基金会支持，在茂县开展羌族原生态文化保护能力提升项目，内容包括：出版 4 期《羌岷》杂志，拍摄几套影片和小额资助原生态文化活动。何叔的羌文化协会就获得资助筹组 09 年的转山会活动。此时，促进会参与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筹组的“灾民自拍社区故事”项目（下称社区拍摄项目），岩窝村被选为项目点，促进会志愿者陈伟协作拍摄，何叔则是主要的村民拍摄者。

如是，两个项目与两个协会紧密结合起来。能力提升项目对拍摄没有明确要求，让项目人员可以发挥更大的自主性，适当揉进社区拍摄的理念和方法；而社区拍摄则为羌文化协会提供拍摄所需的设备、培训和协作，为社区影像铺垫基础。促进会和羌文化协会对羌文化抱着相似的使命，两者都乐意采用影像作为一种工作手法；正是这些共识与共性，两个机构如鱼得水，合作得相当默契。

09 年 2 月，何叔和陈伟参与项目首次培训，根据项目组提出的拍摄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社区力量这个主题，他们计划拍摄松坪沟公路重建。后来，促进会秘书长陆伟建议拍摄社区文化重建，觉得这既切题，亦结合促进会和羌文化协会的工作，可谓一石三鸟。

健硕的何叔年近六旬，因经营木材生意致富，九十年代开发白石海风景区。因多年经营旅游业，照相技术相当娴熟，对录像也萌生了



浓厚兴趣。他对摄像机爱不释手,无论是转山会的筹备会议、培训,还是歌舞排练,他都积极拍摄。协作者陈伟有艺术创作经验,他在技术上指导何叔,例如使用简单实用的场记板,并协作推动拍摄工作的社区参与,例如指导达尔基等年轻人,让他们参与拍摄工作,使拍摄的素材有更丰富的视角和内容。陈伟相信只有在村民自主选题、拍摄以及剪辑时,社区才真正拥有社区拍摄这种社区建设手法。



2009年8月岩窝村转山会女子吹口弦

09年3月,项目组首次到访岩窝村岩窝寨组,何叔在主持活动之余,不忘用摄像机记录过程片段,小小摄影机好像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镜头前的村民,开始时有点害怕、害羞、左躲右避;但很快,他们就好像已经习惯,并爱上它,在镜头前毫无顾虑兴奋地手舞足蹈。5月,陈伟协助剪辑村民拍摄的短片《我们的转山会》;短片以岩窝村春天雪景为背景,记录传统服装和羊皮鼓的制作,以及歌舞排练等转山会准备过程。同月,陈伟和何叔参加了香港社区伙伴在小金和尚村举行的社区拍摄剪辑培训,对社区拍摄的目标和重点加深了认识和理解。

是年8月,岩窝村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转山会。活动持续三天,全村一百多户人大部分都参加了,茂县多位干部和十多家媒体也到场参加。何叔的女婿达尔基拍摄了前两天的活动,陈伟则按照何叔和何国友等长者的意见,剪辑成影片《我们的祭山会》。祭山会是转山会的正式名称。

一堂堂老祖宗的课

转山会结束后第二天晚上,何叔在岩窝村组的集体活动室公房放映《我们的转山会》和《我们的祭山会》两部影片。几十位村民被影片中的快乐情景深深吸引,特别是其中一些滑稽细节,如青年人赛马时摔落马背的镜头,欢笑声不断。放映后,两位何叔向村民介绍社区拍摄项目的基本情况,邀请村民对影片提出改进意见,并请大家反思自己在歌舞表演中的表现。羌族的歌舞每个动作背后凝结的,是久远的历史和民族的信



协作者毛磊(中)在与拍摄者何天发(左)、何国友(右)讨论剪辑

仰,尤其是转山会期间的歌舞,是向山神和祖先献祭和祈福,格外讲究步伐和动作,舞者的神情也需谦恭庄重,以示敬意。长辈如何叔对年轻人在转山会上的表现格外在意;摄像机记录了老人不在场时年轻人随意发挥的祭山歌舞,成为何叔教育年轻人保护传统文化的素材,社区放映也成为了羌文化协会宣传文化保护的一个平台。

祭山会电影刻录的笑声萦绕未了,何叔保护传统文化的计划投向岩窝村下半年的一些重要文化习俗活动,他希望拍摄春节的喜庆;而何国友则要记录一些山水鸟兽等自然风光;两位何叔

把这些想法公示村民。社区拍摄在岩窝村运作了近十个月,要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时,拍摄团队仍然局限在何叔和他几个近亲,陈伟希望更多年轻人参加拍摄的想法,一直没有出现,妇女拿起摄影机的就更少了。陈伟这时向何叔再作讨论,并游说和培训青年如廖四清和何东平等,鼓励他们参与拍摄。而何叔也不再满足于拍摄,他更期望自己可以亲自剪辑影片,这既可以减少对外来协作者的依赖,也可以更自主地取材和说故事。他希望有一台电脑,他要学会剪辑影像。事实上,影像剪辑在整个社区拍摄活动中,确是体现参与和反思的一个关键环节。何叔既强烈又紧迫地表达了这个愿望,是项目组没有想到的。2010年1月,一台二手电脑送到何叔茂县家中。陈伟手把手指导何叔使用编辑软件,没过多久,何叔就编辑出自己第一部短片《羊皮鼓的制作》。

春节是羌文化协会在祭山会外又一重点活动,节庆活动连续十多天:舞龙、团拜、歌舞等,极富羌文化元素。2010年春节,廖四清拿起摄影机,成为主要的社区拍摄者。春节后,毛磊接替陈伟,担负起协作工作。他从岩窝村09年拍摄的与社区文化相关的素材,按春夏秋冬四个章节剪辑出《四季》这套影片,两位何叔及几位村民对草稿提出修改意见,一起编辑春节部分。3月一个晚上,完整的《四季》在岩窝村公房上映,村民反响热烈。放映结束,两位何叔召集部分村民,主要是廖四清等一些青年围着铁三角烤火,一面喝咂酒一面闲谈。毛磊穿针引线,把话题不时转回到社区拍摄和羌文化保护这些主题上。两位何叔向青年人吐露心声,表示长期牵头搞活动身心疲惫,2010年的转山会不想搞了,青年们理解长辈的心情;两代人似乎在这个夜晚加深了相互的谅解。

因社区巡展,《四季》先后在岩窝附近的麦石寨和两河口村放映,每次都引来热烈反应。两位何叔平时很少到其他寨子去,作为羌文化协会的领头人,借着这些放映机



协作者 陈伟

会，增进了与其他寨子之间的交流和感情，也促进了协会在整个岩窝村的传统文化保护宣传工作。《四季》把何叔和他的羌文化协会带出岩窝，并带到成都。地震两周年，项目组在成都举办《四季》放映交流活动。其时，成都电视台采编的节目《我们的村庄》，就采用了岩窝的转山会作为结尾。主持人形容《四季》为一部诗情画意，歌声不断的影片。

摄影机前后的村民

何叔对影像很敏感，很感兴趣，岩窝的村民亦然。在镜头前后，从拍摄到编辑，何叔和他几位亲友组成的松散小组，都是主角，有时是唯一的主角。而相对其他项目点，岩窝村村民的参与度颇高，他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主要拍摄者何叔在茂县知名度高，他家在茂县县城，与女儿一家同住，两个儿子在岩窝村，是一家之主。灾后，他承包了松坪沟修路和白石海景观改造工程，还改建景区自己所有宾馆。公私两忙。但在社区拍摄过程中，一直非常投入、积极和主动，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他善于钻研和探索，在实践中学习和创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和令人尊重的拍摄者。项目前期，基本上机不离手，做了大量拍摄。他善于在做中学，也很会在做中教。达尔基和廖四清是转山会和春节活动的拍摄者，镜头稳定准确，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何叔的指导。项目后半期，何叔更多关注影像的编辑，慢慢尝试编出短片，掌握整个影像制作的技巧。

社区放映是社区拍摄的重要环节，何叔每次都亲临主持，对于放映和讨论的顺利





2010年4月两河口村社区放映

开展起到很大作用。放映前,他会先作简单介绍,放映后,他就主持讨论交流。每次放映活动大概有数十村民参与,比较高的出席率,离不开何叔个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何叔总围绕着羌族文化传承,生动形象地向村民讲解,或开展有关讨论,深化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兴趣。09年8月的转山会,活动引入羌族祭师释比这违反当地习俗的情节,招致村民反感,何叔在紧接的放映会上,就以此为话题,展开了讨论和介绍。

何国友是何叔的隔房兄弟,在拍摄

过程中,一直是何叔的最佳拍档。何叔专心拍摄羌文化活动,他则补充岩窝村的动植物和自然风光。他思路细密,善于表达;第一次社区展播后,他清晰地指出灾后重建中分配不均的现状。达尔基的拍摄技巧来自陈伟和何叔,他镜头中的转山会,得到培训导师和乡亲们的赞赏。廖四清在后期协助拍摄,他所拍的2010年春节活动,同样出色。

淳朴的岩窝村民很少参与拍摄,部分原因在于何叔常年在茂县县城或白石海景区,由他保管的摄像机近乎成了私人物品。部分老人对拍摄内容上是有要求的,很多老年妇女对拍摄都跃跃欲试,她们是很多歌曲和舞蹈的传承者。62岁的王彩珍说,寨子

里好几个妇女都曾经拿起摄像机尝试拍过,她自己也想拍山中美丽的羊角花。村民多次旁观编辑工作,但很少发表意见。参与的广度是够了,但深度还很欠缺。他们主要是被拍摄对象以及观众,在镜头前自然乐天,毫无拘束和做作,看到自己和村里人出现在屏幕上,看到美丽的风光,总会有所触动,发出诚挚质朴的反应。毛磊认为这是源自他们对羌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是岩窝村宝贵的原生态文化,与这里的山水人脉不能分割。

从影像开始社区反思

笑声朗朗,村民享受完一场精彩的光影之旅后,他们对老祖宗的文化有什么想法?对眼下生活会有什么感受?何叔和拍摄小组的影片,为村民提供赏心悦目的娱乐。从09年到10年中,社区因放映有不下十次的大小讨论;但大都没有集中在某个主题上展开,而何叔和拍档们,也还没有在文化保育和承传上提出一些新思路。

09年转山会曾经为岩窝提供一次讨论和反思传统文化的机会:那年,茂县一学者建议,邀请外地一队释比参与祭典,但这有违释比不上神台的地方习俗,村民大为不满。当天,一名女记者违反羌族习俗爬上神台,陈伟加以阻止,几乎与对方几人动起手来。牵头的何叔很恼火,陈伟更是伤感。后来,该学者承诺资助转山会的经费没有兑现,何叔更因此受到村民猜疑。究竟原生态文化,该如何回应或者配合外界的进入和要求,特别是在以旅游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向?什么是原生态文化?岩窝要保护哪些文化传统?内里蕴含着什么价值?有人曾建议何叔用摄影机采访村民,展开有关的讨论,但何叔一直没有这样做。



协作者的话

“岩窝村的羌文化活动本身是很丰富的,项目的摄象和放映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强化了社区参与,提供了新的交流方式、公共平台。影像具有直观、快乐、惯性的特点。”

——协力品酿协作者毛磊

在社区展播后,讨论什么,怎么讨论,基本上由两位何叔自行决定。协作者陈伟坚持村民应该自主。这个原则,无可厚非。只是,当何叔还没有充分理解社区拍摄和社区参与和反思的关系,加上基本的制作和协作讨论技巧,都还需要不断磨练时,要影像



何天发在学习拍摄技巧

展播达到理想的社区讨论和反思似乎很难。展播后,何叔们会问村民:影片拍得如何?哪些好?哪些需要修改或者补充?年轻人看一下自己歌舞唱跳得如何?有哪些要向老人学习改进?等等。大家看得高兴,大都说好。只有一位老人提出:《我们的祭山会》要补充多声部合唱。两位何叔认为,影片对村民特别是青年改进歌舞会有相当帮助:表演不好,放出来给大家看到,会感到难为情。

此外,在这次社区拍摄中,羌文化协会以致村寨管治的接班问题显得异常突出。2010年3月社区展播后,两位何叔与部分青年就转山会和牧场护理等社区公共事务,展开了一场对话,表达了罕见的谅解。尽管这时已经是项目的尾声,但还是令人欣慰。毕竟,对话已经开始。

或者,村民的思考是点点滴滴和静悄悄的;并非如我们所想象,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一起钻研某个观点话题。512中心的项目官员马志勇觉得,两位长者的思想随着项目推展,逐渐有所改变。项目后期,何叔曾私下说想把羌文化协会会长一职交给何国友;个中,除了有身心疲惫的无奈,也有权力平衡的考虑。同样,何国友也多次流露出希望在社区拍摄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又或者,这是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细微的、点滴的、诚挚的碰撞和交往后,所产生的结果吧!

留守老人的孤寂

莫尚凝

广汉市松林镇滴水岩村

早上六点多一点,76岁的罗长健就起床了,他其实很早就醒来,只是山间的天色还不太明朗,就一直躺在床上。在自家大门前坐了好一会儿,罗长健就往地里走去,山间的早上,看不见什么人,以前还有大家听来很是悦耳的小孩上学的吵闹声,但是现在村里的小学并到松林镇小学去了,孩子们都到镇上读书,周末才回家。

罗长健在自家的菜地里转了一会,最后拔了两颗莴笋,然后慢慢踱回家:稍事休息,洗锅,洗菜,煮饭。吃过早饭,已经是早上9点,罗长健把昨晚剩下的饭拌好饲料喂鸡,“咯咯咯”的抢食声,是罗家今天早上出现的第一种声音。

收拾好家务,罗长健背起背篓上山捡柴火去。儿子和媳妇外出打工前,给他买了煤气灶,但是他觉得费钱,舍不得用。一大筐的柴火有点重,罗长健走一路歇一路,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简单吃过一点东西,罗长健往村里走去,找人闲扯一会。

傍晚,罗长健边吃饭边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睡前,他习惯绕自家房子一圈:门前郁葱的庄稼在晚风中轻轻摇曳;远处的果树林慢慢变成黑乎乎一团。当罗长健锁上家门,上床休息,这时,大概是晚上八点。

在滴水岩村,像罗长健这样的老人为数不少。地震以后,为了弥补灾害带来的损失,更多村民跑到外地打工,更多老人被迫孤零零留守在家中。子女放下必须的生活费,老人们独力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罗长健身体还算硬朗,生活上基本没有问题。但一些年纪较长的老人,照顾自己的生活就有点吃力。然而,对大部分老人来说,最大的苦,是那些似乎见不到底,一个人孤寂的日与夜。

原子化的滴水岩村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下称512中心)开展“灾民



自拍社区故事”活动,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下称野草)是五个参与拍摄活动的机构之一。之前,野草在滴水岩村推广旱厕改造,积累了很好的人缘。野草的工作人员何军在村里一露面,村民都笑:“何军那小子又来了。”滴水岩村被野草选为自拍项目点。

广汉市北临德阳市区 17 公里,南距成都市区 23 公里,交通便利,但滴水岩村远离市区,处于广汉市境内最东边,与德阳市中江县、成都市金堂县都是一河之隔,交通略为不便。滴水岩村八组共 105 人,有 40 到 50 人在外打工。留守村内的基本上是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在学儿童。

滴水岩村属于典型的原子化村庄:经济发展能力弱,村民间的关系比较松散。村庄位于半山腰,水资源不足,村民饮水和耕种都遭遇不少困难。村庄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老来难》一片中主角田玉芝



2009年8月滴水岩村社区放映

开始大规模种植果树,但因为水源不足、管理不力等原因,每一亩果园每年大约只收入1,000元。社区干群关系近年比较紧张。2009年初,因灾后重建房屋加固政策执行的争议,引发村民集体抗议,滴水岩村两委被罢免。直到2010年中,主要干部仍由镇干部兼任。

年纪45岁左右的村民一般是初中毕业,到2010年,村中只有三人具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多年来未有人考上大学。罗大述的儿子当年考上一家院校,却因为学费太高而放弃。年轻人一般都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

近年物价不断上扬,生活成本高涨:比如灾后重建,修房的小工工钱就由以前一天15元涨到60元左右,砌砖工匠则由30元涨到100元。村民重视楼房的修建,无论是修房或建房,总觉得不能比别人差。像大部分中国农村,农民不能单靠庄稼过活,外出打工成为滴水岩村民生活的主要出路,劳动力一股劲儿往外,留下老人小孩守护家园。

孤寂的社区拍摄者

2008年11月,何军开始在滴水岩村物色社区拍摄人员。最初,何军让镇政府推荐人选,镇政府推荐了两个年轻人,见面后,何军觉得他们可能不适合在村庄进行长期拍摄工作,一是他们没法很好地和农民打交道,二是感觉他们有些浮躁。于是,何军找到

在旱厕改造活动中认识的罗大述,让罗大述帮忙找两人担任拍摄者。“何军找到我,要我帮忙,我就应该帮他把事情做好。至于为什么是我自己参加拍摄,是因为觉得村里的年轻人都不在,其他人也没有什么文化,学东西也学不好,万一把这件事搞砸了,就对不起何军了。”罗大述说。

寡言耿直的罗大述找到同村的刘期顺,他跟刘期顺说:“村中现在有这样一个活路,要拍摄我们地震之后的故事。何军要求这个人比较有责任心,能够做下去;而且这个工作,也有一些补助。”刘期顺最初不太愿意参加,但是碍于罗大述的面子,也就同意了。刘期顺曾经说:“做这样的工作,能有什么用?”何军在旱厕改造过程中,对于罗大述和刘期顺就有所了解:罗责任心强,是村民小组组长,在村民中颇有威信;刘则很有想法,也有能力。平时这两个人就是好朋友,应该可以完成拍摄任务。

就这样,罗大述和刘期顺参加了2009年1月在成都举行的拍摄培训,滴水岩村村民自拍社区故事项目亦由此展开。从成都回来后,刘期顺提出:“红旗水库好像被污染了,是不是可以拍一下?”而罗大述则提出:“我们这里风景那么好,拍出来宣传一下,让外面的游客都来这里玩……”但是,他心里埋藏着一个希望,却没有对刘期顺说。

罗大述、刘期顺和儿子将红旗水库的水质污染、堤坝出现裂缝等情况拍了下来,刘期顺也协助罗大述拍摄滴水岩村春日繁花似锦的美景。罗、刘两人本来就是好朋友,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着来做。罗大述想,他们这样应该可以把拍摄工作搞得很好。

只是,2009年春节后,刘期顺跟罗大述说自己想退出拍摄组。“拍摄这个东西,感觉没有什么意义,耽误地



协作者马志勇和拍摄者罗大述在讨论剪辑

里的工夫不说，还什么都得不到，真比不上到外面打工划算。”刘期顺说。时年45岁的刘期顺没有参加2009年3月举行的第二期拍摄培训，他的儿子已经结婚自立，没有老人要赡养，家里楼房已经盖好，没有很紧迫的经济压力，但是他仍然选择外出打工挣钱，自此再也没有参加拍摄工作。滴水岩村的拍摄任务，从此也就基本上由罗大述一人承担。

罗大述的心事

罗大述常常一个人拿着摄影机到处拍摄，他是要让村民知道自己在拍摄，同时也让他们不要害怕镜头，慢慢习惯镜头。之

后，他通常会马上播放给被拍摄对象看，及时交流和反馈，促进村民对于拍摄的接纳。

项目组要求拍摄有关地震的故事，罗大述从头到尾记录了邻居拆除地震中受损土坯房和修建新砖混结构房的经过；也拍摄了村民栽种果树、修剪花枝、收获果实等灾后恢复生产的场面。过程中，他更“导演”了整个过程：他要求村民从山上将石头推下来，以表现地震的情景；而村民从栽种果树、修剪枝叶以及采摘果实等，也是在他的要求下





2010年4月社区巡展后协作者讨论会

多次跟罗大述讨论：“滴水岩村有桃花节，是不是可以把桃花节的过程拍摄下来，这样也可以促进村庄旅游……村庄中修路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拍下来，反映社区参与，以及村民的力量……”罗大述肯定马志勇的建议，但却迟迟没有行动。桃花节开幕那天，罗大述拍了开幕式，但节庆中村民的活动和想法都没有拍下来。至于村里修路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拍过。

在一天之内完成。

此外，他还拍摄了：他的孙子、被污染的红旗水库、以及滴水岩村的桃花节等等。但是，形成片子的只有三套：即《向本秀老人的葬礼》、《庙会》以及《连山腰鼓队来到滴水岩村》。

《庙会》记录了滴水岩村村民拜祭菩萨的情况。庙会前一天，罗大述就开始做准备，除了全程记录庙会的过程外，他还把电视机搬到场地上，即场放映还没剪辑的片断。项目第一期展播适逢其会，来自云南的顾问老师郭净对庙会印象深刻，认为这反映农村一个重要的文化面向，特别是灾后重建，人类面对威力强大深不可测的自然力量，心存敬畏，心灵更需要慰藉和依托。连山老年腰鼓队在庙会上演出片断，后来被剪辑成《连山腰鼓队来到滴水岩村》。村民一般认为《庙会》很好地表现了本地的文化特色。

但是，罗大述和野草都一直感觉没有很好的拍摄题材，起码罗大述对何军表达出来的想法是这样：没有什么好拍。512中心的马志勇



2009年8月项目中期评估顾问 郭净



野草协作者 何军



拍摄者 罗大述

直到2010年3月，罗大述将一些拍摄片段拿给何军后，大家才明白罗大述真正的想法：他心中最想拍的，是村庄留守老人的生活困境。

村中的留守老人

滴水岩村空巢化，是在2000年前后村中年轻人大规模外出打工开始。

地震对村庄的破坏不大，没有造成伤亡，只是有土坯房倒塌了，有砖石结构的楼房墙体开裂，但结构未损，不影响居住。有村民需要修缮房屋，有些就趁机修建新房。无论是修缮受损房屋或恢复经济生产，都需要资金，为了应付这些需要，也为了以后更好地生活，村民陆续外出打工，留守老人群体因而扩大。

从2009年初拿到摄像机开始，罗大述想到要拍摄的，就是村中的留守老人。“我的母亲患了风湿病，卧病在床，一年到头都没有见过房门外面的事情。逢年过节，我们兄弟才背着她在村子里走一走，看一看。村里其他老人，子女到广东打工，他们的生活就很困难了……很早以前，我就想讲讲这个问题。”罗大述说。

征得老人同意之后，罗大述就开始拍摄。2009年8月初，何军协助罗大述剪辑完成《坚强的滴水村老人》，在罗大述的院子里向乡里第一次公开展示。影片拍摄两个留守老人艰难而坚强地生



项目监管小组成员田军与田玉芝老人

活和劳动的情景：刘春秀老人自个儿在厨房打火煮饭，一只猫儿在灶台上跳来跳去；和着咸菜，老人吃下半碗饭；然后，背着大箩筐拄着拐杖，老人慢慢挪动步子，上山捡柴。途中她遇上另一位也正在砍柴枝的老人。荆棘干枯，老人粗糙的手掌将荆棘拢捆成小扎，收满沉沉的一箩筐后，就慢慢往家里走去。2010年春节期间，年青人回家过年，罗大述对老人的子女儿媳进行跟踪拍摄和访谈，最后由马志勇协作剪辑成《老来难》。

影像前后的骚动

在拍摄题材方面，野草协作者何军认为：“罗叔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也坚持自己的原则，我充分尊重罗叔的意见。”因此，何军主要是帮助罗大述解决技术问题，比如罗大述拍摄时手发抖，何军就建议他想办法让拍摄对象坐下来，然后用脚架固定摄像机来拍摄。

何军觉得滴水岩村的社区土壤本来就有问题：太碎片化，村民之间很少往来，多只考虑个人眼前利益，缺乏集体观念。比如改造旱厕，事前早已告诉村民，材料是他们的，但放存在村长家中东西，还是一夜之间被偷光，村民似乎认为东西只有拿到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何军认为村民得改变思想，社区工作才能开展，而比较有效的做法，是让村庄内部发生变化，诱发村民自己去思考；在这方面，村民又比外来人做得更好。

拍摄完成后编出来的片子，是罗大述全部想法的呈现。何军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帮

助罗大述，“很多时候都是鼓励他，让他有信心完成这个工作。”

罗大述心之所系，是村中留守老人。“地震后，村里所受影响不是很大，关于地震方面的题材真的不好找。我是生产队队长，平时就看见阿婆在家身体不好，拍这些东西就想教育村民多锻炼身体……这个问题，很久之前就想跟大家说一说，让大家重视，但是不知道怎么说，也没有机会说。”2009年8月初，《坚强的滴水村老人》第一次在村中放映，现场有三十多个村民。片子带来一阵肃静，气氛有点沉重；很多村民很久都没有说话，一些则提出几个问题：如果我家里也有一个老人，我该怎么办？以后我老了，会怎么样？

摄像机成为一向寡言的罗大述的交流工具，拿着摄像机，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面对很想当面问个清楚而一直不敢发问的人，他终于问了个痛痛快快。按照农民的逻辑，赡养老人是自家事，不是兄弟，一般不会干涉。摄像机给罗大述提供了一个新的人际交流方式。一旦放下摄像机，罗大述又似乎不会说话了，起码不会再跟他的采访对象提这个问题。

2010年3月，《老来难》一片展播之后，村民对老年人的处境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在一起会讨论影片的内容，形成街头巷尾的话题。一般的村民都表示影片拍摄得不错，反映村民问题，有意义。这些主要是老年人，深受留守之苦，却不好跟子女说。比如罗长健，全程观看了《老来难》，还参加了2010年4月19日巡展当晚的会议。

影片放映后，村民慢慢有了一些改变。罗大峰是《老来难》一片中刘春秀老人的儿子，妻子以及女儿都在外打工，以前因为“女人不在家，家都不成家的样子，”所以天天



（左起）通家婆婆、田春风、蔡文秀



我们的山，

打牌,一打就是一天,老母亲只有自己做饭和洗衣。看完《老来难》中自己母亲的艰难处境,也在罗大述的劝说后,罗大峰打牌收敛多了,每天都会给母亲做饭盒和洗衣。2010年中罗大峰在家门前砌搭一个洗衣台:“洗衣方便一些……以前做得不好。”罗大峰说。杨泗明是《老来难》一片中田玉芝老人的儿子,2009年前,夫妻俩及孩子均在广东打工,只留下田玉芝老人在家。2010年春节回家,看完《老来难》之后,妻子留家照顾老人。村民更加关爱老人的行为,是项目取得的具体成果。

此外,村民对社区拍摄亦有了期待:余勇伟和罗大峰等人希望罗大述将水资源不足、村民用水困难的问题拍出来,以引起政府部门或者学者的注意。“水的问题,他没有拍,希望他拍,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罗大峰说。

从个人到社区

空巢化使整个滴水岩村经常静悄悄的,缺乏生气。何军说:“走在路上,可能两个小时都不会遇到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这次社区拍摄前后共有七人:罗大述、罗大述的两个弟弟及弟媳刘昌凤,刘期顺及其儿子,但是他们一直未能形成一个拍摄小组。2009年滴水岩村两委被罢免,村中的公共活动只有庙会,大家都是“冲着菩萨的面子”去的;野草在村中推广旱厕改造之前,村中没有其他机构或社区组织开展过活动。基层政府组织缺位,社区组织缺位,村庄的公共事务无人组织管理。

野草在灾后来到滴水岩村,因旱厕工作积累了很好的人缘。尽管拍摄团队一直没有形成,但在社区拍摄的过程中,村民可以参与,互相启发,最终形成反思。何军希望罗



大述会改变,进而带动滴水岩村改变。事实上,罗大述通过镜头,把他思考的老人问题,化成对社区的质问,推动社区反思,并带来了实际的改变。影像发挥了奇妙而独特的作用。马志勇接替何军协作罗大述后期的拍摄工作,帮助他编辑影片,在村中宣传展播。马志勇认为社区发展要动员社区的力量,协作机构有一定局限:“社区问题,最终还得由社区来解决。”

总的来说,罗大述个人对老人问题的执着和认真,是影像最终能够促进社区反思和行动的关键。罗大述用深情的影像,表达人们也许麻木或视而不见的困顿,他不避嫌疑,数次劝说乡里罗大峰,要他照顾好老母亲。此外,外来协作者经常在罗大峰家门前经过,对当事人也造成了某种心理压力。而通过影像,村民对老人的情况有了直观了解:哪一家人对老人怎样,都看在眼里。一个社区共同的关注点,终于浮出水面。大家感觉社区力量好像动员起来了。

以前,罗大述只是靠自己一个人蛮干,经常无法解决问题。现在,他身边多了一些社区活动分子,比如龚长琼和刘昌凤。显然,由罗大述的点,到龚长琼和刘昌凤的面的社区动力已经开始萌芽。经过拍摄以及一系列培训和交流后,罗大述想把什邡(请参阅《讲述耳朵的故事》案例报告)的经验拍下来,试图以此组织村民搞规模种植,“摄像机可以帮我团结大家……到时,经济发展了,年轻人都在村里种果树,老人就不用受苦了。”罗大述说。

协作者的话

“在中国当前乡土文化已经残破的背景下,村民普遍缺乏责任、信任意识,这是项目在这个点上开展的社区土壤。机构期待在这样的前提下,促进村里个别村民的参与、反思,而不期待形成较大规模的活动和组织。“观念的改变”是重点。而在村民意识改变之前,真正的社区参与和反思是不可能的。

“项目的推展不能单靠村民,而是要依靠协作者。最终大家达成共识——不论谁来做社区动员,项目都应为操作者提供相应的能力培训。

“另一方面,协作者、协作机构、512 中心和社区伙伴在项目的合作过程中,大家的矛盾与磨合,沟通与交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和反思的过程。”

——野草协作者何军

社区拍摄的土壤 与阳光空气……



镜头的迷思

莫尚凝 陈惠芳

对于不少正在奔小康的中国农村,摄影机早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对着摄影机小小的镜头,人们摆出心目中最理想最适当的体态和表情,镜头和影像不再陌生。但是,对某一些村落,摄影机却肯定是新生事物。要把心目中的事情好好拍下来,编成一套流畅的影子,跟村民分享,更是中国很少数农村的经验。但影像语言本身,它的制作过程,以及展播,都具备促进个人以及社区思考及参与的元素。早在 80 年代中期,一些非政府组织已经看中参与式社区拍摄的特点,使用这个手法促进社区建设。

新的交流渠道、平台、人际关系

四川 512 灾后四个社区拍摄的案例,经验不一。其中滴水岩村的社区拍摄者罗大述把影像的特点,发挥得比较尽至。摄像机来到滴水岩村前,留守老人乏人照顾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农村劳动力外流,每年春节后,村民“孔雀东南飞”,留下老年人独守家园。“我早就看见村里老人的困难,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罗大述说。老人生活难一直是他心头一个结,但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交流过。

摄像机为这个心结找到出口,成为罗大述表述和交流的工具。“以前,我想跟人家说留守老人的事,但是说不出口,不知道怎么说。”罗大述拿着摄影机瞄准村民杨泗明,直面提问:“你家老人的生活这样,你是怎么想的?”罗杨并非亲戚,以前根本不可能碰这个问题。罗大述手脚勤快而话少,很多时候他感觉自己说话逻辑性不强,说不明白心里所想。但是,通过摄影机,罗大述的表达相当流利顺畅,有条有理。他在摄影机后面提问,内容直接清晰,甚至给人很大胆的感觉。罗大述似乎变了另外一个人。摄影机给罗大述一个新的交流渠道,摄影机和影像在社区搭建新的平台、以及新的人际互动关系。

同样,茂县岩窝村的何天发很好地利用了拍摄和社区展播的机会,跟村子里的长

辈和年轻人一起反刍羌族传统文化:在拍摄过程中,拍摄者和社区积极讨论片子的内容;直观的影像,在每个人的脑袋,以及在社区范围内,或深或浅或多或少,激起一些涟漪,一阵回响;当大家聚在一起看片,小小的房间,充满你我熟悉的味道,在小凳子上互相靠拢,轻松地温习集体的老祖宗的承传。而茂县羌族人民的生活喜乐,也随着何叔和摄影团队的作品《四季》,走进成都其他社群中去。

什邡桐林村的张杨给村里 70 岁大爷拍下他的祝生喜宴,觉得很有意义,“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有照过相呢。”他又给村里每户人家拍全家福,作为 2010 年的春节礼物:一份带着无限心意的珍贵影像记录。张杨如此编织了一张温馨的人际网络。相对富裕的桐林村村民比较熟悉镜头,对拍摄表现得有点冷漠,但在展播《我们村的黄背木耳》时,他们热烈讨论,再一次检视木耳菌渣污染,以及其他社区的问题。具体的影像唤起村民沉睡的意识,感觉出来了,这可是我们大家的事啊,什么时候我们曾经聚在一起有这样的讨论呢!很快,张杨和拍档邹茜拍的黄背木耳菌渣处理片段,就被四川卫视公众频道用上,长期困扰桐林村的问题,跑出了小小的村落。

2009 年 5 月,拍摄培训在小金和尚村举行,学员分组用镜头跟村民聊天,听他们对拍摄的意见。每个村民都是主角,经过剪辑,他们在屏幕上对话,一些以前没有或很少交流的村民,现在互相看到听见。这个视听交流平台,让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社群,例如妇女、老人以及小孩得到同等机会和尊重,参与议论社区事务;过去因时

罗大述与技术指导陈宇



间、习惯、以及其他种种限制,一直被忽略的脸孔和声音,出现了、响起了。和尚村拍村民接送娃娃上学行路难,呈现修路破坏植被,引起山体滑坡,路不成路,希望影片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地震第二年,政府拨款重修山路。影像是否起了村民期望的效果,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村民对影像的可能性有了更大的想象:他们要拍修路,让子孙知道修路难以及保护环境的重要,要让这个思考留存延续。

强制关注、视角转换、重复呈现

罗大述的镜头聚焦在村里已经习以为常的留守老人身上:村庄恬静的景貌接上老人孤单的身影,踉跄的身躯艰难地烧火做饭,特写跟着老人风霜的脸、裂痕满布的手,颤抖地艰难地收拾带刺的柴火,一举手一投足,没有旁白,平实的影像领着观众走进老人们那无以名状的孤困中去。身边事情和景象被聚焦,罗大述巧妙发挥了摄像机强制关注的特点,把我们的眼睛放在村民习以为常,可能已经视而不见的身边事物上,叫人无从回避。罗大述的摄像机也对准杨泗明,让一直没有倾诉途径的杨泗明,把想法和感受讲出来。社区拍摄者的镜头要我们看见要我们听见,从而衍生更深入的思考,以至行动。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因感官的局限和习惯,我们一直活在一套主观的惯性视觉世界里。摄影机的镜头可以跳出我们的局限和习惯,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的头顶、我们视线范围外,在我们不惯常看事情的角度拍摄,展示一个新的景观,带来一种新的感觉。从来是观众的村民,现在是主角,他们在画面中载歌载舞、闲话家长、议论公共事务:滴水岩村庙会上跳腰鼓的妇女、岩窝村转山会的锅庄、桐林村从来没有拍过照片的老人、小金村民讨论修路的种种情况等等。这种新感觉带来什么思考,每人都不同,也许有一天会发芽。

同一个情景,可以重复使用,以达到或加强某个信息的力度。老人劳动的境况,在罗大述的影片中重复出现:孤单的身影,在观众眼前来来回回。而且,影片可以重复播放,观众可以翻看再翻看,细味个中的感觉和信息。张杨的木耳渣污染的问题,在村里播放、在公众电视频道上播放,反复看,问题的感觉加深了,思考也许就自然随之而至。

摄影机在滴水岩村、桐林村、岩窝村和小金,不同程度发挥了促进社区建设的特点:公众事务,如桐林的木耳渣污染、如小金的修路,因拍摄成为社区的焦点;一些被忽略的公众事务,如滴水岩的留守老人,被聚焦,引起关注和反思,甚至具体行动;一些社区共同的文化,如岩窝羌族的转山会,得以记录存案,成为文化承传的一个重要载体,创造了交流讨论的平台,又可以广播流传,作教育、宣传、以至参与公众讨论和影响政府决策等等。

社区就是土壤

高雪松 陈惠芳

如果把社区拍摄比喻成一颗种子,那社区就是它赖以发芽、成长的土壤和环境。

地利、人和

要能长出强壮的庄稼,土壤里要有健康活跃多样化的微生物;要社区拍摄达到推动社区参与和反思的效果,社区骨干和领袖、社区文化、公共事务管理、以及村民对拍摄的兴趣和能力等等都需要互相配合。在四个案例中,小金和尚村和茂县的岩窝村都拥有丰美的土壤。

小金的和尚村虽然地处偏远,但外界的变化,尤其是政府政策的影响依然很大,不少传统文化和村级的治理结构也一直面对不小的冲击。但小小的和尚村的带头人能干又开放,在忙于处理村务之余,他们一直是社区拍摄活动的主心骨。无论是拍摄、编辑、以及展播,他们都积极参与,在培训活动上的表现,叫导师赞叹不已。而作为村长的拍摄者王晴飞,一开始就把拍摄的目标向村民讲解,很快就解除了村民对摄影机的警戒,成为他们讨论村子议题和行动的一个可能方向。

小金尝试用影像来探索修路跟生态环境的关系,村民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当镜头对着村民问这问那时,他们自然轻松,看展播时,就更是踊跃,大伙在阴冷的晚上,坐在空旷的学校球场上,很有耐心地观看村民自拍的影片。如果不是村干部和拍摄者王晴飞的号召力,也是村里那比较凝聚的社群文化传统,以及大家想看同乡如何拍修路这个牵涉到社区共同利益的议题所使然。

茂县跟和尚村很类似:茂县的拍摄团队是会首组织和羌文化保护协会的会长和副

会长,他们既有社会地位,对社区事务、传统文化和动员有丰富经验和热情。如何保护羌族文化是何叔和协作机构的共同议题。何天发对拍摄很感兴趣,摄影机不离手,每次培训都非常投入,他不单要拍,还要亲自编辑。他的拍摄小组是他的近亲和好友,有年轻的小伙子也有经验丰富的长者。村民对拍摄亦从陌生到接受及喜欢,除了在镜头前出场,亦是坐上观众。跟和尚村差不多,何天发的号召力,以及拍摄议题是大家喜欢的传统活动,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桐林村的张杨以及滴水岩村的罗大述所在社区,没有和尚村和茂县的好土壤。桐林村和滴水岩村的基层组织涣散,推动社区工作寸步为艰。滴水岩村年轻劳动力都跑到城市去,留下老人小孩;桐林村各家自扫门前雪,人们对公众事务表现得无奈、无力甚至冷漠。这两处的社区土壤都可以说非常贫瘠。可幸的是,张杨和罗大述都找到一些社区关切的共同议题:桐林的木耳菌渣污染,滴水岩村的留守老人;而张杨和罗大述对拍摄亦抱着期望和热情,他们拍出来的影像以及产生的社区反响,也叫人惊喜。

适时的阳光空气

社区拍摄不是要培养出几个掌握拍摄技术的村民精英,而是要让拍摄作为方法和工具,促进村民共同讨论、思考和行动,增强社区能力,推动社区建设。社区拍摄提供一个平台,一系列机会和方法,让社区走到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讨论和思考共同面对的问题。

四个案例中的外来协作机构,和尚村的社区伙伴、茂县的协力品酿(前身为茂县社区可持续发展促进会)、滴水岩村的野草和桐林村的爱白,在初期一直致力协作,培训村民拍摄小组掌握基本的拍摄技术:如主题构思、拍、编、剪等,让村民有能力通过影像表达所思所想,进而达到推动社区参与和反思的目标。和尚村的社区拍摄小组和滴水岩村的罗大述,在参加项目培训前从来没有用过摄影机。四个案例的拍摄者,尽管初学,但都能拍出不错的影像。拿起摄影机,他们都聚焦在个人或社区关注的事务上,但如何把小组或个人的关注成为社区的议题?从而出现观念以及行为方面的改变?

和尚村的小组希望社区能够明白破坏植被的后果,张杨则希望加强村民对木耳菌渣污染的认识,罗大述要村民正视留守老人的困顿,何天发就希望保存羌族文化传统,期望年轻人增加认识和归属感。要圆这些梦,外来协作机构就不能停留在技术的培训上,需要增强村民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其中至关重要是社区参与和讨论的协作能力;让社区拍摄不停留在纯粹是一个活动这个层面上,而是一个社区项目的方法和组成部分。

和尚村的拍摄小组本来想利用影像“向外部争取资源和支持”,社区伙伴在拍摄培训时,就很好地通过社区展播和分组拍摄,为推动村民“内部讨论、深入认识问题”建立了基础。只可惜社区伙伴没有进一步深入协作社区讨论环境和修路的关系,错失良机。

2010年3月社区伙伴支持和尚村开展替代生计,尝试种植中草药,以减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尚村因养殖过多牲畜,近年更大量养山羊,草山资源超载。2010年就有多宗牛羊因草料不足而死亡的事件,生计与生态环境的冲突,非常明显。然而,拍摄小组和其他村民都不认为能够通过内部协商和行动,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社区伙伴尝试结合社区拍摄和替代生计去回应,希望可以让拍摄小组记录替代生计中的资金借贷活动,记录中药材种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用来跟村民讨论如何应对。但因社区伙伴工作很多很忙,根本无法及时协作甚至了解社区在此方面的进展,这也是外来协作机构在社区工作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有了想法和方法,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落实。

至于桐林村,爱白在拍摄的第二周期,就把协作的角色交回社区,增加社区的资源,也加强了社区这方面成长的动力。拍摄者张杨除了参与512中心的技术培训外,更有机会到云南参加“云之南”的社区影像活动。在那里,他有很大的触动,对社区影像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有不少的启发。此外,他还参与其他机构提供的关于社区工作的培训。在这方面,张杨比其他村民拍摄者都强。再者,爱白也一直帮忙村民拍摄者协作影片主题的讨论,尽管张杨成功改善木耳菌渣的污染问题,影片更在成都的公众频道上播放,但由于社区土壤相对贫瘠,社区内部要出现明显的效果,还需要更大的投入和更长的时间。

在滴水岩村,野草早前在旱厕项目结束后,在社区已没有具体活动,协作者何军也比较忙,社区中例如讨论和展播的协作,主要在第一期的评估时进行。在滴水岩,外来机构的投入和协作,对村民反思留守老人问题这一环节,扮演比较轻微的角色。茂县的何天发很积极参加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他所属协会很清晰影像的作用,尽管没有协作机构很强的协作,但在社区里还是引起了讨论。何天发很有热情,继续使用影像,推进羌文化的保育。

在这四个不同的社区,“社区拍摄”这颗种子在过去18个月开始发芽,村里有人可以掌握拍摄的技术,并已经拍出了反映村民生活和愿望的片子。带来理念和方法的外来机构一定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感情,陪伴社区走过一段段深入探究的过程,纵然这个过程可能会像和尚村的山路那样盘亘崎岖,但只要坚持向前走,前方下一个转弯之处或许就有雪山、晚霞、烂漫山花等美景。

美丽的相遇

马志勇 刘易平 陈惠芳

社区拍摄能成为社区建设的手法,需要有适当的环境和元素配合,才可以推动社区参与和反思。其中,社区拍摄能够为协作机构以及社区拍摄者和他们的社区组织所用,是关键所在。

结合项目需要

茂县岩窝村的经验,在这方面非常突出。摄影机进入茂县岩窝村,如鱼得水。摄影机受到社区拍摄者何天发和协作机构茂县促进会的珍爱,主要原因是它刚好配合何天发和他负责的茂县羌族原生态文化协会(下称羌文化协会)的需求,配合协作机构茂县可持续发展促进会(下称茂促会)的工作。

影像对羌文化协会很有用,它把羌原生态文化:歌舞也好、音乐也好、本民族服饰和用品,以致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和各种礼仪庆典中的细节等等,可以声色俱全原汁原味地记录保存起来。影像不但记录了,还可以重复播放,广为流传,是推广和促进羌文化的很好载体。作为协作伙伴的茂促会,保护原生态文化是机构的目标,汶川地震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和资金,以文字和影像,去落实这个想法。

岩窝村的拍摄者何天发是岩窝的知名人士,参与开发当地的旅游区白石海,也是羌文化协会的创会成员。茂县吸引游客的,除了优美的天然景色外,就是羌族传统文化。何天发等有感羌族文化习俗日渐衰落,於2003年创办松坪沟老年协会,希望开始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尝试。2007年,老年协会改为羌文化协会,名正言顺开展记录、保护、推广以及开发羌族传统文化的工作。羌文化协会还主持村里各种节庆和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推广羌语。地震前,羌文化协会已经拥有一百多名会员,全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代表参加。协会定期组织歌舞排练,在节庆时举办歌舞演出,不时参加茂县举办的各种歌舞展示活动。协会结合白石海景区,介绍游客在饱览自然山水后,再到岩窝村感受



岩窝村社区放映

羌族原生态文化。羌文化在旅游经济这个环节上,存在一份微妙的关系。

地震后,茂县政府大力支持举办岩窝村转山会,而茂促会得到资助,与羌文化协会合作,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等支持,记录和推广茂县的原生态文化。天时地利人和,结合传统文化的社区拍摄,本来就是促进会和羌文化协会工作计划之内的事情。

转山会是文化协会第一个主要的拍摄主题,从筹备、排练、到三天会期的活动,何天发和他的拍摄小组都一一追踪拍摄,并在协作机构的协助下,很快就剪成影片,在会后第二个晚上,向乡亲播放。其后,何天发和协作机构又剪辑了记录传统羊皮鼓制作的《羊皮鼓的制作》和岩窝村羌民生活情况的《四季》两部电影,无论在岩窝或者是外村,电影都受到赞赏。

何天发把每一次放映活动都变成了羌文化协会的聚会，并继之以旅游接待演练，把社区拍摄紧紧与羌文化协会的活动结合起来，成为内容艰巨繁重的羌文化重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还担当起辅助推广当地文化旅游的责任。尽管何天发公私两忙，无论大小的拍摄和放映活动，他总是不遗余力的全情投入。

环看滴水岩村和拍摄者罗大述，情况就显得有点吃力。罗大述拍摄时比较孤单，放映时的社区反应也没有茂县般积极。社区拍摄对协作机构野草来说，只是一个骤然而至的单项活动，跟机构和村里的恒常活动关系不大。桐林村的张杨开始时，同样有点寂寞和迷失，尽管爱白的协作者一直不离不弃，协助张杨进行剪接等活动，并把协作的资源拨归张杨使用；但爱白在地震后不久，就完成了其在桐林的项目，撤离桐林。可幸的是，张杨不断寻索，建立了自己的合作社，找到合作社与拍摄的切合点，以及村民共同关注的议题。拍摄最后帮忙推进张杨的合作社要处理的菌渣的讨论。社区伙伴在小金尝试以社区拍摄这种手法，引起村民对修路破坏植被的讨论的反思，拍摄结合了项目和当地村民的需要，前期的发展，一直令人鼓舞。只是到了后期，协作机构和村民都没能利用社区影像提供的契机，引导社区深入讨论和反思相关议题。

结合社区参与和反思

在茂县，社区拍摄一直着眼于羌文化的推广和承传，但记录只是其中一步。协作机构和何天发，都曾经尝试利用拍摄活动，鼓励村民加深对本文化的认识和思考。协作者陈伟鼓励年轻人参与拍摄，他强调村民自主自发的原则，他们怎么想就怎么拍，想到什么程度就拍到什么程度，很少引导村民；选题和拍摄如是，编辑和放映时的讨论亦然。何天发和文化协会的长老们是放映讨论的主持，主要围绕影片的拍摄内容讨论，很少进入一些较具体或村里一些较争议性的议题中探索。对何天发来说，影像对年轻人学习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是看到自己的舞蹈哪处出错了，大家在一起，也可以排练排练。如是，文化承传在茂县，尽管结合了影像，但更多是记录和流传，还没能谈到反思和深化。

桐林村的情况跟茂县有点相似，社区拍摄跟合作社的需要结合，但社区的参与和讨论反思，却同样未能深入；与茂县不同的是，社区相对冷淡的反应源自社区对公共事务的异化多于源自协作不力，人们对改变现状那种深深的无力和无助感，是桐林村的协作和拍摄者张杨其中一个最困扰的桎梏。在小金，社区伙伴一开始就结合社区拍摄与项目活动，让拍摄有一个可喜的出现和发展，无奈未能配合适当的跟进，项目期望的效果没能达到。

从理念到实践

马志勇

缘起

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居民自拍社区故事”(下称灾民自拍)项目,源于四川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下称 512 中心)希望记录灾后重建中的不同社区力量和可能性,社区伙伴积极参与项目设计,尝试探索社区影像如何作为一种社区建设的手法,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由于灾后工作和人员配置的紧张和限制,项目设计未能对参与项目的机构和社区进行可行性评估,无论是项目人员以及参与项目的 512 成员机构,都没有充分时间讨论项目设计,只能努力在工作中慢慢琢磨完善。

活动设计

1、项目目标:希望通过灾民自拍,推动社区对灾后重建的参与和反思;而参与机构在协作社区拍摄的过程中,能够探索和实践社区影像这种社区建设的工作方法。

2、项目活动:项目活动主要分两方面,由 512 中心的项目组负责执行,一方面是促进拍摄者与协作机构的相关能力,包括社区拍摄和社区动员等;另一方面是技术和协作支援,包括拍摄团队对活动的追踪拍摄和社区巡展等等。由于社区伙伴在项目点小金和珙县,也尝试推展社区拍摄这个手法,所以 512 中心和社区伙伴,差不多同时向项目伙伴展开社区拍摄的培训活动。512 中心项目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参与机构和社区拍摄者,参与了社区伙伴组织的部分或三次培训活动。社区伙伴还资助其他有关的学习和交流,包括参加 2008 年山水在成都举办的社区拍摄交流会、2009 年初在昆明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等等。项目设计了拍摄团队跟踪拍摄环节,希望把过程中重要的经验记录下来,成为往后交流学习的材料。项目周期 18 个月,分两期推展,设有阶段性的社区展播和评估学习。

项目操作和管理

项目的主要相关群体包括:512 中心和其项目工作人员、社区伙伴、512 中心五个参与成员机构、社区拍摄者以及社区组织。社区伙伴既是资助方,也是项目的同行者,同期操作小金与珙县的社区拍摄项目,互相学习参照;512 中心理事组成项目监督管理小组,直接指导项目工作人员协调资源、协作培训和交流学习、以及拍摄团队的跟拍活动和评估学习等等;五个成员机构及其协作者,则负责协作社区拍摄者进行社区拍摄和展播等活动,推动社区建设;而社区拍摄者及其社区是项目的主体,操作具体拍摄和参与相关的项目活动。社区伙伴的对口伙伴是 512 中心;中心跟五个参与成员机构是对口伙伴;而社区拍摄者则是成员机构在地的项目伙伴。

无论对项目组人员、参与机构与社区拍摄者来说,参与式社区拍摄都是一个新课题。但基于灾后重建的特殊环境,以及项目推行时间比较仓促,再加上协作机构在工作和人员调配上都有不少变动,各相关群体在社区拍摄作为社区工作方法,以及项目的设计和实际操作等问题的掌握和沟通都很不足够,甚至出现颇大的差异。这个问题,在项目开始时尤其突出,导致活动操作偏离项目的目标和设计。例如有参与机构把社区拍摄视为一项文娱活动,目的纯粹是为了给社区提供多一种消闲活动,忽略了社区拍摄跟参与和反思的关系;有机构在项目启动不久,其社区项目就告一段落,甚至撤离,跟社区只保持一个疏离的关系,未能为社区拍摄者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协作,工作显得有点拉扯,难以深化社区拍摄作为社区建设一种手法的探索。

在培训阶段表现比较突出的社区伙伴小金项目,前期的协作和社区主题跟社区拍摄结合得比较紧密。512 中心的一个项目点茂县,无论是协作机构或社区拍摄伙伴,都能够把拍摄活动紧扣所属组织的工作重点,社区参与的积极性较高,社区拍摄者对拍摄有要求和投入。

培训(详情请参考《参与式社区拍摄培训》一文)

1、培训活动:512 中心举办了三次培训,第一次是拍摄基础和项目目标的认识,第二次是编导,第三次是剪辑。培训使协作者和拍摄者掌握基本的拍摄编辑技能。2009 年 8 月中期评估后,又进行了三次社区工作坊,希望从影片、参与和反思三个方面,



强化协作者和拍摄者对项目目标和方法的认识与把握。

社区伙伴则为项目点、伙伴机构以及其他对社区拍摄感兴趣的机构举办了三次培训,内容包括基本拍摄技巧、社区拍摄理念、以及参与式社区拍摄的技巧等。最后一次培训,更在小金实地进行。

2、培训效果:各相关群体对培训有不同需求:社区拍摄者以技术掌握为要务;协作者则渴望学习社区工作方法,包括协作社区动员、社区参与和组织讨论等;项目组方面就希望深入认识和掌握社区影像的理论和技術。培训需要满足这三方面的需要,得好好计划和做比较针对性的安排。从过去 18 个月的经验来看,协作社区组织、社区动员和社区反思方面的能力,都需要加强。

操作过程

2008 年底,512 中心公开遴选 5 五个成员机构参加这个社区拍摄项目,这些机构是:茂县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后改称协力品酿)、成都爱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及 NGO 备灾中心。现简介其中三个项目点的情况:

1、茂县岩窝村:以社区拍摄者何天发为代表的羌族原生态文化保护协会,对社区影像有很大需求,也有很强的操作能力。茂县可持续发展促进会的协作者陈伟,主张村民自主拍摄、编辑和放映以及讨论,协作者仅给与技术支持,一旦村民完全掌握技术,协作者即可退出。社区拍摄与社区组织的工作结合,也与协作机构的项目结合,进行得比较顺利,



马志勇(左一)在项目组中期评估总结会上

只是在反思方面因协作不足而较为缺乏。

2、广汉滴水岩村:社区拍摄者罗大述对影像作为记录和表达手段很有兴趣,也有自己比较执着的想法。第一周期野草文化协作者何军,协助罗大述进行编辑和协作社区讨论。第二周期时,512 中心的马志勇通过每月一次下点,协作社区放映和讨论,鼓励拍摄反映社区整体需求的题材,但没有获得积极回应。罗大述个人关注的议题,是本项目点的关键,他坚持拍摄留守老人,在此前提下与协作者合作,逐渐影响了村民,作出相应的改变。

野草文化采用了类似承包的方式将项目工作交给拍摄者,优点在于事先明确责权关系,避免后来的纠纷。但由于野草已经结束了在滴水岩村的旱厕改造项目,机构工作跟社区拍摄的关系不强,而何军在点上的工作时间也比较少,难以像项目期待地那样协作拍摄以及社区的参与和反思。

3、什邡桐林村:社区拍摄者张杨是一个有志于民间公益事业青年,得到爱白中心多方扶持,参加了在昆明举办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对社区拍摄有所启发和反思。其后,又得到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开始在村里组建合作社,并有效地把拍摄结合到合作社的工作上,推动社区参与和反思。协作者陈东擅长影像技能,对农村的了解在过程中慢慢积累。从第二周期开始,爱白将项目转交给张杨的合作社,一是给了合作社资源和动力,二是使协作者更加贴近社区。在这个项目点,社区影像与合作社工作逐渐靠近并结合,成为顺利完成的其中一个关键。

经验评估

项目评估是学习和经验总结,然后再出发的一个重要步骤;在适当时候循环学习

和总结,有助及时回应实际的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和配合。参与式社区拍摄项目原来没有计划进行中期评估,因为考虑到第一周期是伙伴熟悉和掌握拍摄理念和技巧的阶段,项目经验和效果要在项目结束时才能比较清楚的呈现出来。而鉴于社区拍摄的理念和做法对参与伙伴来说相对陌生,为了促进学习和交



岩窝村协作者陈伟(左)与拍摄者何天发(右)

流,更好推进和深化第二周期的活动,社区伙伴与 512 中心合作,在 2009 年 7 月底 8 月间,于五个项目点进行了一次中期评估。

中期评估结合第一期社区展播活动进行,在社区影像方面有专长和丰富经验的顾问老师郭净和田犁,分别到不同的点上去做访谈和交流,对前一阶段的活动,

以及第二期的计划提出意见。顾问老师直接跟拍摄者和村民交流,对参与机构和社区来说就像是学生提交了论文,得到老师认真又细致的评语和建议。郭净老师在广汉高度评价罗大述的编导才能,以及他灵活地应用拍摄素材去进行社区放映,提高社区对影像的兴趣、好奇和参与。罗大述较个人但独特的拍摄方法,带来明显的社区反思和改变(详见滴水岩村案例一文)。中期评估最后举办了一个工作坊,让参加机构和拍摄者分享学习各自的经验教训,并一起共同计划第二期活动,突出深化社区拍摄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这个作用,使随后的项目活动更针对不同社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爱白在什邡桐林村第二期的协作,在寻找资源、协助编辑、组织讨论等方面,方向和目标都明显更为清晰。

项目结束前,社区伙伴再跟 512 中心合作,把项目终期评估调整成一趟项目的经验记录、交流和传播。项目经验总结方面,挑选了社区伙伴的项目点小金,512 三个项目点:爱白的什邡桐林村、协力品酿的茂县岩窝村、以及野草文化的广汉滴水岩村,作为深入研究分析的案例,总结社区拍摄如何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成为社区组织进行社区建设的一种工作手法。2010 年中,研究员向 512 中心三个案例的机构协作者和拍摄者分享研究结果,进一步巩固他们的项目经验。最后,项目经验将会跟五个参与机构,以及更多有兴趣做社区拍摄的个人和组织交流和传递。

观察和挑战

1、项目设计:正如前文所说,项目推展时间仓促,主要负责落实项目的人员大部分没有参与前期的讨论和设计过程,造成对项目各个方面的理解上出现颇大的落差。在挑选参与的项目点方面,亦因为时间仓促,没有做好前期的可行性探索,导致在项目操作过程中,未能比较有针对性地调整或设计相关的培训和社区活动。社区参与和反思,是一个无休止的旅程;显而易见,持续和适当的培训学习,对社区拍摄者以及社区组织都非常重要。此外,摄像机是项目重要的工具,对社区来说,是一项新的公共资源。然



桐林村协作者陈东(左)与拍摄者张杨(右)

而,项目设计中却没有突出这个特点,例如没有建议动员社区讨论,为摄影机制定明确的公共资源管理制度,错失了推动社区合作的契机。

2、社区放映:社区放映是社区拍摄活动中一个重要环节,根据活动的进程和社区情况,通过不同的放映方式来实行,除了能够达至不同的效果,也慢慢累积了协作社区参与和反思的经验。

2.1 社区展播:社区展播在项目中期和末期各举行一次,是项目一个重要的活动。在展播中,项目点协作者和拍摄者共同主持放映和讨论,项目组参与过程并主持总结会议。尽管各方都比较重视这些展播机会,但结果却因协作不足,参与人数在某些社区不算踊跃、讨论也不充分。

2.2 社区巡展:社区巡展由项目组组织和主持,结合社区工作坊举行,选择各项目点拍摄的一些与放映社区有比较密切关系的影片作公开放映和讨论。但在实际操作中,因社区工作坊密集进行,使巡展的准备和参与都并不充分。比如,茂县岩窝村社区巡展可以选择广汉滴水岩村老人影片,结合当地代沟问题,讨论老年青年互助,或选择什邡桐林村的环保影片,结合当地草场破坏讨论环境保护等等,但当时都没有做。

2.3 家庭放映:广汉滴水岩村在第二周期由协作者推动的家庭放映做过多次,放的都是社区题材的短片。优点是气氛融洽,讨论充分。后来社区展播的规模不大,也接近家庭放映模式。总的来看,家庭放映较能引发讨论,这跟放映方式有一定关系。

2.4 素材放映:在第一周期初期,广汉滴水岩村和茂县岩窝村由拍摄者按村民要求,曾经多次放映素材,促进了社区对项目的认识,有利拍摄的推进。这一阶段过后,由于村民对影像减少新鲜感和兴趣,所以很少进行。

3、社区拍摄者:茂县岩窝村的何天发和什邡桐林村的张杨,都认为自己是项目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和他们的社区团体都很需要摄像机和拍摄。社区参与和反思,对他们的组织工作的改善,也是相当需要。但广汉滴水岩村的罗大述,则认为自己主要是项目的一个工作人员,尽管他爱好拍摄,影片对他本人和部分村民都有纪念意义,但觉得自己并不需要社区拍摄及相关活动,感到未能在活动中受益。

五个拍摄者对社区影像的需求情况不一:何天发和张杨觉得有这个需求,但罗大述任组长的小组因为没能行动起来,出现比如生态水果的产销活动,他就觉得社区影像可有可无。罗大述可以说是独立地进行拍摄,没有社区组织或社区项目作为承托,但他的拍摄和放映,产生了以社区参与和社区反思为核心的社区建设活动。滴水岩村在社区土壤和文化方面,跟岩窝村和桐林村有很大差异,展示了另外一种社区拍摄作为社区建设的可能性。

参与式社区拍摄培训

邹 乔 田 犁

在四川,使用社区拍摄作为社区建设工作手法是一种新尝试。社区伙伴在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后开展相关的项目以及培训活动,希望配合项目点和伙伴的需要,促进相关社群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技巧。顾名思义,社区拍摄有社区和拍摄这两个重要的部分,鉴于拍摄技术的培训资料,其他机构或项目已有丰富的记录,在这里我们主要偏重于介绍社区拍摄中,如何通过社区拍摄达到社区反思和参与的培训内容。

社区拍摄培训

技术培训的必要性

参与式社区拍摄培训包含社区参与式动员和拍摄技术两部分内容,社区伙伴支持的两个社区拍摄项目,尝试将两部分内容融合在一起。社区伙伴组织的培训,相对严谨一些;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下称 512 中心)操作的,则更多将拍摄技术的培训与具体的社区工作结合在一起;各有特色。但基于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如何让社区掌握拍摄的能力,并由此表达自身的观点,引发社区参与和反思,因此,在这里我们较侧重分享社区伙伴的培训实践。

但必须强调的是,拍摄技术的培训是社区拍摄能否发挥预期效果的基础。如果比喻社区拍摄是让社区用绘画去展示社区感情和心声的话,那么社区拍摄培训就如同培训社区怎么绘画。村民懂得绘画未必就能画出社区的感情和心声,但是否会画画显然是完成画作的基础,至于村民会否纯粹是个人表达的精英画家,抑或绘画能成为社区

的一个群体的表达沟通途径,则需要项目设计来跟进。因此,在社区拍摄中,让村民学会拍摄,以及让这种拍摄能够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两者同样重要。

培训方案

关于摄影培训,已经有很多专业的培训教材和方法,但由于培训的对象是拿惯了锄头的农民,他们不会像摄影爱好者那样,先有拍摄热情和需求再开始学习拍摄,因此有必要在设计培训方案前,对村民的需求做一些分析。

影像记录对很多社区来说还是全新的东西,因此,培训方案一则要考虑社区的反应,二则要考虑项目的根本目标,使培训与这些因素相互配合。通常社区对影像的反应和需求都有这样几个阶段:新奇的玩具、摄影机作为一个实用工具做记录取证、熟悉进而感到麻木、或者通过镜头,观察生活进行自我表达。

第一阶段:通常摄影机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大家都乐于在里面看到自己,获得一种心理满足,就如同有人热衷于用摄影机拍摄家庭录像一样。第二阶段:摄影机是个实用的工具,可以用它来取证或留记录等,或者试图把自己好的东西通过图像展示出来,用它沟通和宣传。比如,拍婚礼,记录农田被污染的证据等。第三阶段,社区开始熟悉摄影机,多数人不再对它感到兴趣。这时候需要一个提高,让社区对影像的认识发生变化,进而透过镜头不同的角度来重新打量社区,揭示那些他们自己熟悉但都点些麻木的东西,即开始换角度反思社区,或者社区可以表达自己的关注和观点。

项目最终目标在于促进社区参与和反思,因此,影像记录这个工具最有贡献的,实际是在第三阶段。通过镜头,人们观察到的东西会与肉眼看到的東西有所差别,即镜头视角,这是摄影机本身会带来的变化。但第三阶段并不会自然而然到来,它需要掌握摄





2009年1月田犁(左)做社区伙伴第一次社区拍摄培训

影机的人真正对镜头对影像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并且能够驾驭影像记录工具,才能发生。

推荐社区拍摄培训分为三个部分:摄影培训、编导培训和编辑培训。这三个部分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从而达到不同的效果,层层深入,直到社区能够拍摄出一个成型的影片。

- 摄影培训:主要是讲解摄影机的使用,摄影的基本知识;预期成果是受训者能够使用摄影机,拍摄出可供编辑使用的影像素材。

- 编导培训:主要讲解一个片子是怎样

做出来的:影片的基本类别和表达方式、影片主题、编导思想、影片架构、摄制的过程等。预期成果:受训者对拍摄影片有一个基本了解,能够初步驾驭摄影机,能完成一个影片的构思和拍摄。

- 编辑培训:主要复习编导思想的培训内容,讲解镜头语言的基本规律,影像与抽象信息的关系与配合,编辑的基本规则和编辑软件的使用。预期成果:受训者能够初步掌握编辑工具和规律,能与别人配合,把影像素材编辑成为一个影片。

培训的特点和经验

参与式社区拍摄培训从项目的角度说,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上文介绍的拍摄技术



培训后的白板

培训;此外则是社区工作方面,如组织能力、领导力、社区工作方法和社区会议协作培训等。这些都是社区工作的基础,为大家所熟知,因此不在此讨论。

由于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差异,社区居民对掌握摄影机不像专业人员那么得心应手,学习和掌握摄影机也许不像知识分子群体般容易。影像是一种表达和交流的工具,社区居民在使用摄影机上往往会面临更多困难,可能被扭曲或未能畅所欲言。所以,社区摄影培训就是用一种简单快捷的方式,让学员迅速掌握拍摄的要点,让这个工具能够为他们所用,而不会被摄影机拖着走,可以比较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可以在拍摄中感受到拍摄的乐趣和表达的愉悦。事实证明,这些简单快捷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很多社区代表都在简短的培训,掌握了拍摄的规律之后,激发出潜藏在他们身上的天赋,拍摄出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员的作品来。四川小金县和尚村拍摄的几个练习作品,就让人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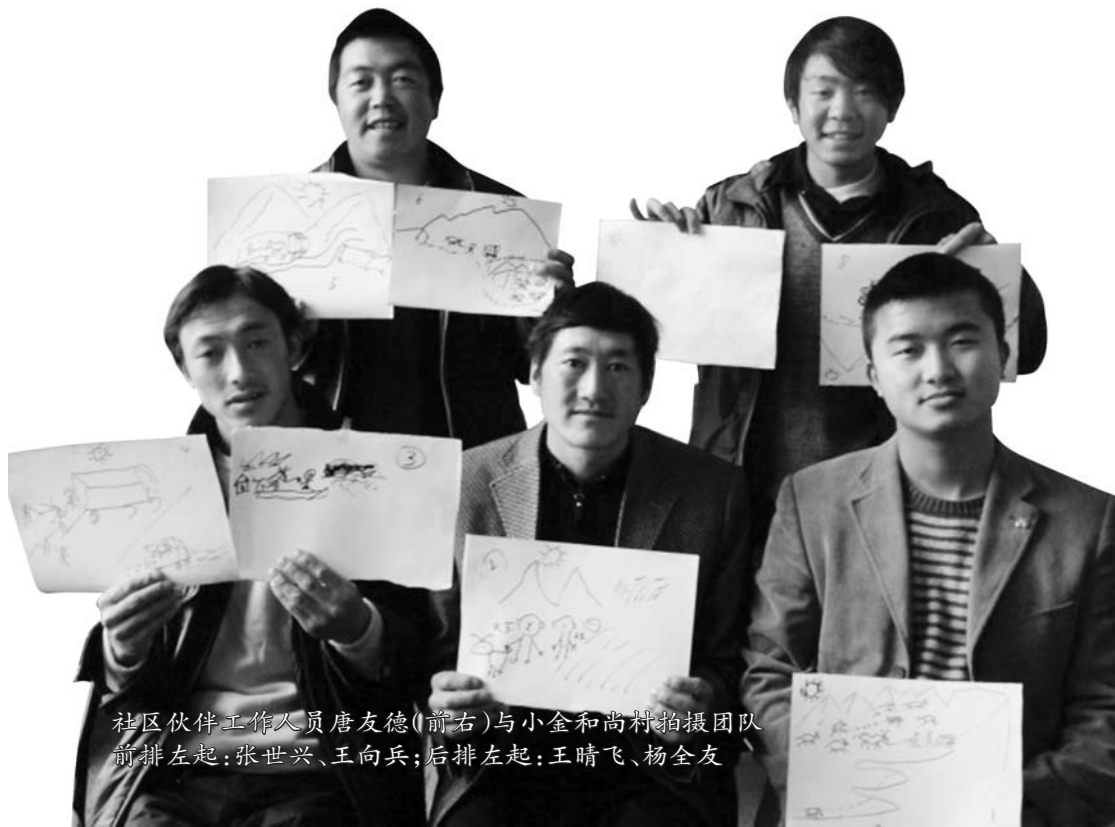
如是,培训首要是打消学员的畏惧心理,重要的是要多练习,并且能够将练习拍摄的东西及时播放出来,一起讨论和分享,在练习中获得乐趣,感受学到新东西的喜悦。对学员拍摄的素材和编辑出的东西,都要及时点评,切忌讲很深奥的道理,让他们对摄影感到更加畏惧。

培训过程中,宜多用做游戏,在轻松中学习。此外,尽可能多用绘画方式讲解镜头或者场景,构思影片。社区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绘图的方式,也更容易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想法,辅助他们形成自己的拍摄思路或编辑思路。

在培训前应做好技术准备:1. 参训人员须携带摄影机及各种相关配件;2. 参训人员组成小团队(机构人员与村民),配备电脑,确认有编辑软件(movie maker);3. 主办方提供投影仪、讲课用具、电视机及数据线,并确保能正常运作;4. 主办方准备好样片存入电脑;除了讲师,主办方还应提供一个协助人,并准备好评估表。

社区伙伴和 512 中心的培训经验

这里以社区伙伴和 512 中心分别操作的两个社区影像培训为例,说明培训的要点。



社区伙伴工作人员唐友德(前右)与小金和尚村拍摄团队
前排左起:张世兴、王向兵;后排左起:王晴飞、杨全友

社区伙伴

社区伙伴筹办了三次社区影像培训,过程相对较长,循序渐进地提高学员的能力。

第一次培训

第一次培训于 2009 年 1 月 16-18 日在成都举行。除了邀请 512 项目组工作人员、社区伙伴项目点珙县和小金的村民拍摄者和协作者之外,还邀请了对社区拍摄感兴趣的合作伙伴:陕西省妇源汇、AEA 助学行动,以及在社区拍摄方面已有经验的机构山水来参加和交流,促进学习和思考。培训预期的效果包括:参与者掌握基本拍摄技术,对社区拍摄有初步讨论和认识;并带着这些思考和对拍摄的兴趣,开始尝试社区拍摄。

培训活动主要介绍摄像机的使用方法、镜头与景别、拍摄的基本技巧等,也对什么



2009年3月陈惠芳(站)做第二次社区拍摄培训

是社区影像进行了讨论,促进参加者对社区拍摄的认识和思考。讨论社区影像的环节分为两部分:首先让每个项目点或团队内部讨论,然后分享他们理解的社区拍摄,呈现社区拍摄的多元和多方想象……接着是观摩三部影片:河研会的《四哥的电影路》、AEA 助学行动的《小A的夏



“看见了”

天》和山水项目村民拍摄的《三江巡山记》。之后,大家从“谁拍、拍什么、拍给谁看”三个方面对影片展开讨论。社区拍摄就是由社区拍摄社区中大家都熟悉的内容,然后展示给社区和其他群体观看?在过程中,如何提升当地社区的自豪感和能力?如何促进社区的反思和参与?社区参与又应该包括哪几方面:摄像机的使用、影像的产出?

第二次培训

第二次培训于2009年3月7-9日在成都举行。内容包括:影片的基本要素和类型、影片的编导过程、社区拍摄的作用和方法等,希望学员在基本摄像技能的基础上,掌握编导的技术和知识,并同时认识如何在社区拍摄过程中,促进社区参与和组织化。培训对象基本与第一期培训相同,新参与者有小母牛发展交流部的吕蓓,以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研究参与式影像的老师韩鸿。

社区拍摄牵涉到影像和社区建设工作的不同特性,以及两者的配合和互动等相对复杂的关系,对于没有拍摄基础,或者缺乏基本的社区工作经验的参加者而言,会较难把握。如是,在第一次培训的基础上,这次设计了更多围绕社区拍摄的理念的学习活动。

培训第一天下午,介绍社区拍摄的基本概念、缘起和作用。开始前,先来一个游戏“看见了”:活动由一个人拿着摄影机拍摄,其他人只能透过拍摄者的镜头观看现场,然后分享感受。游戏让大家体会到镜头所展示的“真实”只是局部真实,镜头既有局限性也有选择性,因此,在拍摄时,要警惕这个特点,谨慎考虑如何使用摄影机来表达,并考



学员用连环画呈现集体拍摄构思 1



学员用连环画呈现集体拍摄构思 2



学员用连环画呈现集体拍摄构思 3

考虑拍摄者、被拍摄者和观众的立场和感觉。

游戏热身并引起思考,之后就开始介绍社区拍摄的特点:这既可以从社区和拍摄两块来看;也可以从社区拍摄所体现的目标、牵涉的目标群体和主题这三方面分析,呼应第一次培训时提到的“谁拍,拍谁,拍什么”,以及为什么拍。

社区拍摄可以达到不同的目标,在促进社区建设方面,国外一个案例²就尝试两种类型的社区拍摄:一是外来专家给村民传授拍摄技术,村民拍自己的生活或问题,进而促进内部讨论、反思和行动,带来改变;另一种则是外来团队拍摄社区的问题,然后借助社区以外的力量或政策,促进社区改变。相对来说,后者比前者容易操作,也是较多机构已经使用的方法。但前者以社区作为主体,村民掌握拍摄技术后,拍摄与自己社区息息相关的议题,村子一起观看讨论,深化对社区存在问题的意识,从而带出社区事务的改变行动,这种社区拍摄也叫参与式社区拍摄。它可以促进个人和社区成长,促进社区的参与和沟通,更可以倡导政策改变。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如何在社区拍摄中实现社区参与,包括怎样确定主题、怎样拍、如何保证摄影机为社区所用,以及怎样达成社区共识等,学员

分组进行一个名叫《村里来了个新的摄影机》的活动。每个参加者都想象自己是村民，小组里每个人都要对着摄影机说自己的想法，然后进行讨论，并拍摄讨论过程，然后大组分享。活动的目标是希望加深认识社区内部讨论并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和困难，也更加理解社区参与的过程和重要性。

培训第二天下午是案例分析，进一步深化学员对社区影像的思考。小母牛的吕蓓分享社区影像的案例3，韩鸿则分享吴文光的“村民影像计划”的案例4。案例讨论主要指出，并非把拍摄方法和技巧教给村民，给村民摄像机，就是社区拍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拍摄者需要跟村民沟通，让社区可以参与编导影片的内容，否则作为社区影像的作用还是不能体现出来。

为了让学员能够理解社区参与工作方法与影片构思如何结合，学员以《王二娃借钱》为题，采用连环画来讨论拍摄线索，每人画一幅画表达自己的想法，小组最终以连环画的形式呈现集体构思。组内每个成员的意见都被包括在故事内，大家发现每个人的思考有不同侧重，彼此可以互相补充，使故事更加丰富；当然，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很多时会有意见分歧和冲突；但是，如何参与、聆听、接纳、共容和妥协，却是一个难得又宝贵的经验。

培训最后一天再一次回顾社区拍摄的关键点，以巩固对于社区拍摄的理解：

- 社区拍摄是社区的人拍摄关于社区的事，然后放给包括社区观看的过程；
- 拍摄的过程大家互动参与：是拍的人，被拍的人，拍的人之间，以及各群体参与互动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可能实现社区建设，而且通过影像，还可以发现新的过程和方法。
- 要让社区拍摄最后对社区建设发生作用，就要考虑摄像机要放在谁的手里，要拍什么内容，由谁决定，过程如何进行等等，这都要做社区拍摄的人需要好好考虑的。

第三次培训

最后一次培训在2009年5月3-8日进行，培训地点从成都转到田野：社区伙伴的项目点小金县和尚村。这次培训的目标有两个：1.掌握剪接技术；2.巩固社区拍摄的理念和整体操作技巧。参加者包括：小金的拍摄小组和协作者、珙县的协作者，以及512项目两个点的拍摄者和协作者。此次培训把社区参与拍摄的理念，演绎成实际的课程活动，让参与者在现实的社区拍摄过程中，实践社区参与和反思。

培训前两天主要是培训剪辑技术，让学员完整地掌握拍摄-编辑-剪辑全套技术，为其后两天整体走一遍社区拍摄，做好技术方面的准备。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1、社区宣传



社区伙伴吴美玲(站)在中期评估总结会

2009年5月5日晚上,小金项目点协作者王成以看电影为名,召集村民。会上,培训团队简单介绍社区拍摄,以及此次来和尚村的目的和计划。和尚村的拍摄小组接着向村民汇报之前在成都培训学到的东西,以及回到村里后进行的一些拍摄事情。村民对拍摄小组制作的片子非常感兴趣,要求放映拍摄小组刚剪辑完成,反映当地修路的片子《王向兵接娃娃》。之后,拍摄小组成员王晴飞和协作者王成一起协作村民讨论。讨论反映了村民对修路这个主题的认识和关注度、他们对拍摄者在片中表达的意见的反应、对影片这种说故事的形式感兴趣、以及他们感兴趣的其他拍摄主题等等。在这里,社区放映达到社区宣传的目的,是村民参与社区拍摄的一个环节,让社区了解拍摄者即将在社区开展的工作,从而让感兴趣的村民有可能参与到社区拍摄的过程中来。同时,这也是拍摄者了解社区兴趣、听取社区意见的良好途径,让社区共同关注的议题浮出水面,成为社区拍摄的主题。

2、社区访谈

5月6日,培训学员分为五组,由和尚村拍摄小组成员和村民带领,用摄影机访谈村民,主题主要围绕:对前一天放映的影片的补充意见;感兴趣的拍摄主题及原因;以及拍摄对村子的影响。这既可以进一步在村里宣传社区拍摄,也进一步了解并加深村

民对社区拍摄的看法。五个小组分别以阴山、阳山、挖虫草、建新房、集体耕种为线索,展开社区走访,在宣传社区拍摄的同时,兼顾关注和尚村不同社群的生活和生计,充分照顾社区拍摄中“社区”的视角。

社区的走访和拍摄,进一步拉近社区与拍摄团队的关系,也让社区对于镜头不再那么陌生和敏感。更多村民和他们的生活被拍摄下来,让他们体会到被关注的愉快;在镜头里看到自己和熟悉的朋友,让村民对拍摄更感兴趣和好奇。拍摄小组和外来参加者在过程中,亲身体会到社区拍摄里“社区”两个字的含义。相较社区宣传,更多村民可以更近距离地参与到社区拍摄里。

3、剪辑

5月7日,基于五个小组各自拍摄的社区访谈素材,导师带领各组分别进行组内讨论和剪辑,准备在当天晚上放映。各小组密锣紧鼓地进行剪辑,讨论热火朝天,既相互争论又密切合作。小组之间还会时不时地互相“侦查”进度,暗自较劲,兴致甚高。

由于时间的限制,也为了避免活动密集过于扰民,这种剪辑方式的社区参与度并不高。但一定程度上,分组讨论剪辑模拟社区剪辑中听取不同意见,达至共识的过程。如果能够让更多村民一起讨论脚本的编辑、不同镜头的使用和增减,社区参与的效果会更好。

4、社区放映

5月7日晚上,拍摄小组再次召集村民观影。首先放映了其他项目点村民拍摄的短片,获得村民欣赏,让拍摄者们大受鼓舞。接着是放映前两天社区访谈的片子,村民看到自己出现在影片里,议论纷纷,格外兴奋。协作者和拍摄团队乘着村民的高兴劲儿,带动村民讨论未来的拍摄主题,为后续社区拍摄打下了基础。

社区放映是促成社区参与的重要环节。放映本身具有凝聚社区的功能,且因为方式轻松有趣,更易吸引人们参与。村民通过看电影聚在一起,围绕影片议论评说,既可以为他们提供新的交流话题和方式,促进人际交往,甚至会促成社区走在一起,共同面对和解决社区问题。当然,在此过程中,适当的协作和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来说,最后这趟培训进入到社区里,把社区拍摄的流程走了一遍:村民拍摄者初步掌握了剪辑技术,在协作者的协作下做出自己的片子;其他村民通过活动知道社区拍摄项目的展开,参与到拍摄中来,集中观看影片,对于拍摄主题和影片给予不少意见;此外,活动让外来参与者和村民拍摄者,更深地理解社区拍摄的理念和流程,认识团队的重要性。在小金的培训效果很好,这跟良好的本地协作、小金拍摄团队的积极性和领悟力、小金社区的强而有序的组织 and 集体精神,都有很密切的关联。

512 中心

512 中心从 2009 年开始举办一系列培训和社区工作坊,配合项目活动推展,促成社区参与和社区反思。初期的培训集中在拍摄技术方面,在项目运作了一段时间后,就组织了一个比较集中的两天培训,展现上文提出的培训要点。而在项目中期举办的社区工作坊,则借鉴社区伙伴的小金培训经验,把培训和学习放到不同项目点上,分别回应社区拍摄中三个关键环节:社区影像、社区参与和社区反思。这里简单介绍第一个以社区文化记录为主题的工作坊。

为了提高各项目点拍摄制作的水平,同时增进之间的交流,512 中心项目组与岩窝村项目点协作者陈伟、拍摄者何天发等,在 2009 年 12 月 8 日在岩窝村举办了一个社区纪录片工作坊。参与者来自 512 项目五个项目点的协作者和拍摄者代表。与会者讨论了:

1、社区文化纪录片的概念:大多数人认为,目前社区纪录片最有代表性的类型,是由云南白马文化推动的社区人类学纪录片,内容偏重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民俗文化,形式偏重客观真实的记录。512 项目的纪录片,内容偏重灾后农村社区文化生活的重建,形式上也偏重客观真实的记录,可以称之为社区文化纪录片。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狭义的文化活动,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文化内容,但特别重视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文化。

2、社区文化纪录片的重点:在当前的农村社区,由于电视的普及以及交通的便捷,主流文化已经普遍深入人心。地方文化包括社区文化普遍处于边缘地位,但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滴水岩村项目点罗大述拍摄的丧葬仪式活动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传统法事和现代歌舞通过丧葬活动有机地结合,受到村民广泛认同。而二期的拍摄计划中,茂县岩窝村的羌文化保护,彭州江桥村的文艺队,绵竹武都村的艺术团,也与社区特色文化直接有关。

3、拍摄者、协作者的分工合作:拍摄者是社区代表,了解社区情况,主要进行拍摄,协作者是民间组织代表,了解项目目标,主要进行编辑。双方因为环境、经历、知识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对影片的认识有所差异,只有通过不断地沟通,才能逐渐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完成理想的影片。

【注 1】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 2009 年 11 月出版的培训手册《村民视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内,对影像拍摄的技术培训有详细记录。

【注2】“参与式影像起源于1967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在纽芬兰地区实验成功的“福古岛程式”Fogo Process)。在这项名为“挑战变革”Challenge for Change)的计划中,加拿大政府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拟重新安置偏远的福古岛上散居的岛民。导演兼制片人Colin Low与纽芬兰纪念大学(MUN)的Donald Snowden成立了一个“福古小组”,将互动的电影作为一种促进相对贫困地区社会变革和给民众赋权的工具,给平时无法“发声”的岛民一个聚焦当下问题和讨论的机会。他们将摄影机交到当地人手里,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阐发自己的观点。“福古小组”共拍摄了28部关于岛民生活和事件的短片,并岛上在35个地点放映。散居在岛上十个社区近三分之二的岛民,通过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意识到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开始意识到团结和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决策部门在观看电影后,也有了跟这些很少听到的草根声音进行交流的机会,并最终导致政府公共决策的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福古岛建立了造船厂和渔业加工厂,岛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得以解决,福古岛的历史从此彻底改变。之后,这个以“福古岛程式”为名的影像实验,开始在全球推广,成为参与式影像的基本模式。”以上文字引用自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韩鸿的《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注3】小母牛在甘孜州的一个项目,开始时,项目工作人员先自己拍摄当地一些生活影片,放给居民看,引起居民的兴趣。然后,项目教村民怎么使用摄像机,把片子放给自己或让其他人观看。过一段时间后,工作人员回去看村民们的片子,跟他们一起讨论片中记录的事情,给他们建议。当地一直有一个风俗,有客人过来的时,就要跳舞给客人看,有了摄像机后,他们发现可以把歌舞都拍下来,等有客人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放给客人看,而不需要每次都跳。他们把好几个地方的歌舞拍下来,选跳得最好的拍下来,刻成光盘,不仅可以自己看,还可以出售,有所收入。

【注4】吴文光在2005年跟欧盟的中国村庄治理项目下一个子项目合作时,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一则广告,在全国招十名农民参与项目。十名从全国挑选出来的农民到北京接受培训,每人获发一个摄影机。他们回到村后,分别拍了自己村子的事情,内容包括村民自治和财务管理等,然后交给吴文光编辑。之后吴把片子拿到中央电视台的“法治世界”节目播放。项目组又组织了七位知识分子和学者到北京评讲制片者。随后,这些片子被送到新加坡及香港等许多国际电影节播映。事情引起一些人的质疑:知识分子对影像的解读,到底对社区影像有什么意义?英国一个基金会编制的一本关于社区影像拍摄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简单把摄像机交到农民手里不是社区影像。这十部影片从来没有在当地播放过,拍摄过程只是拍摄者独立拍摄,没有跟当地村民产生互动,没有把摄像机当成一种沟通媒介,进入社区治理、社区生活和社区建设中,纯粹像旁观者般拍摄一些影像,然后拿出来播放,村民没有机会看到拍摄者在当地拍摄的内容。另一位美国学者说过:如果拍摄的社区影像不能让当地人收看的话,那么这个社区影像就是没有效果的。社区影像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社区的参与。

附录



附表 1：社区伙伴第一次社区拍摄培训日程

时 间	活 动		主 讲	主持人
2009 年 1 月 16 日				
9:00	破冰			邹 乔
9:10	项目的目标和背景		何德贤	邹 乔
9:20	培训的计划安排		田 犁	邹 乔
9:30	影片观摩	《冰川》或《巡山》		田 犁
10:00	观众点评	感觉是啥,好坏;自己能拍么		
10:15	摄影机使用的 基本知识		田 犁	田 犁
12:00	午餐			
14:00	影像的基本知识	讲解:镜头的基本知识; 分镜头与场景; 如何分镜头; 练习和点评;讨论 样片:《鲁热的新家》、《蓑衣》	田 犁	田 犁
17:30	总结	总结,家庭作业,次日任务	田 犁	田 犁
17:40	结束			

17 日				
9:00	复习和分享	各小组复述昨天的过程，分享学到什么；摄影机使用测试	田 犁	田 犁
9:15	复习概述		田 犁	田 犁
10:00	摄影实践	分小组：命题作文《某宾馆里的一堂课》	田 犁	田 犁
10:30	分享与点评	小组介绍自己为什么这么拍；大家提意见 / 点评	田 犁	田 犁
11:00	拍摄的要点	缺点归纳，怎么防止出错讨论拍摄的 " 军规 "	田 犁	田 犁
12:00	午餐			
14:00	拍摄的要点复习	各小组竞争	田 犁	田 犁
14:30	命题拍摄	各小组抽签，完成单场景短片	田 犁	田 犁
15:30	分享与点评	各个小组的短片分享；对比军规大家提意见 / 点评，	田 犁	田 犁
17:00	样片讨论	《四哥电影路》或《马老师的扫盲班》	田 犁	田 犁
17:30	结束			

18 日				
9:00	复习和分享	各小组分享,复习	田 犁	邹 乔
9:30	复习概述		田 犁	邹 乔
9:45	NGO 研讨	NGO 社区摄影的经验分享	德 贤 芳 子	邹 乔
12:00	午餐			
14:00	学员自命题拍摄	抽签 / 自命题	田 犁	田 犁
14:30	分享与点评	为什么这么拍,自评 / 点评	田 犁	田 犁
15:30	共性问题的归纳 与分析		田 犁	田 犁
16:30	场景转换	镜头的功能与场景转换	田 犁	田 犁
17:00	样片	《蓑衣》	田 犁	田 犁
17:30	学员感受分享	学员分享;反馈	邹 乔	邹 乔

附表 2：不同团体对于社区拍摄的理解(来自社区伙伴第一次社区拍摄培训)

珙县	1.可以影响大众,能借助为宣传的窗口 2.从社区视角出发,感受思想意识的改变
AEA 助学行动	1.记录机构拍项目过程,有利对外交流 2.社区自己拍的,可以搭建公共平台,促进社区凝聚
陕西妇源会	1.当地志愿者拍 2.记录社区变化过程 3.可以宣传、提高社区参与性
河研会	1.由当地村民拍摄 2.展现村民力量、能力 3.用作在村民、公众间宣传
山水	1.社区自选拍摄主题 2.社区分享,提升社区自豪感 3.社区能力建设,通过公众网络展示社区
小金	1.村民拍 2.展示社区对修路的反思
田犁	1.结果 vs 过程 2.社区自己定拍摄的主题和怎么拍摄,拍摄可以成为一种公共事物,促进公共管理,社区组织化。需要制定规则、分工和管理等。

附表 3：社区伙伴第二次社区拍摄培训日程

3 月 7 日(周六)	回顾与分享,社区组织培训
上 午	1.介绍课程安排和目标; 2.复习上一期学习要点; 3.影片的分享(每个小组春节拍摄的,如果没有带影片,可安排他们在学习前一天,小组自拍一个自己的生活); 4.拍摄经验的互相点评和分享;(拍摄中遇到哪些困难? 最大收获是什么? 自己最满意的是什么?)
下 午	1.社区拍摄的基本概念(什么是社区拍摄,源起、作用? 案例); 2.参与式的基本概念; 3.讨论:分享的影片是怎么确定主题? 是怎么拍出来的? 如何保证摄影机为社区所用? 怎样达成社区共识?
3 月 8 日(周日)	影片的编导与拍摄
上 午	1.影片的基本类型,不同类型对应的拍摄方法; 2.影片的基本要素(镜头-场景-结构;线索,情绪,故事,人物,话题……); 3.影片的构思从大纲到脚本 故事片,纪录片
下 午	1.社区工作方法与影片构思的结合——社区如何确定拍摄主题并平衡不同的意见 2.集体讨论:构思一个跟培训相关的电影主题 推荐:社区影像培训对社区能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在成都的这些日子》; 每个小组,提出自己的电影拍摄大纲 3.根据大纲细化,完成家庭作业
3 月 9 日(周一)	影片的编导拍摄过程
上 午	1.各小组的习作分享; 2.影片的拍摄(剧组的构成与分工;影片拍摄与制作的基本过程;拍摄的几个要点;编导的技巧;后期编辑与编导、拍摄的关系
下 午	1.社区工作方法与影片拍摄过程如何结合; 2.回顾与展望;3.反馈

附表 4：社区伙伴第三次社区拍摄培训日程

2009 年 5 月	活 动	细 项	
	剪接技术培训		
3、4 日		技术包括电脑剪接、旁白配音、片头片尾制作以学员拍摄的片段,制作一套短片	田犁
	社区拍摄重演		
5 日			
15:30	细化活动内容	田犁、邹乔、小平与王成参与讨论	芳子
20:30 -22:00	村民大会	向村民自我介绍,以及来和尚村的目的 汇报过去两趟培训的内容,学员分享感受 播放剪接好的短片 村民反馈 向村民介绍未来几天活动安排	王成 邹乔
22:30 -23:10	活动反馈	学员讨论反馈村民大会成效	芳子 田犁
6 日			
10:00 -13:00	田地头的村民访谈	分 5 组进行,由和尚村的学员带领,访谈村民,注意让弱势社群有发表机会。访谈主题为: 1.对前一天放映的短片(关于修路的),有什么补充意见; 2.如果要再拍片,拍什么? 3.为什么? 4.认为拍摄对村有什么影响?	田犁
14:00	午餐		
15:30	反馈上午拍摄的情况	分享经验 继续拍摄要注意事项	芳子 田犁
16:30	继续拍摄	上午没有访谈的,希望都能够拍下来	
20:00	晚饭		

21:00 - 22:30	茂县、珙县、小渔洞与小金的培训学员之间,分享拍摄经验	各参加学员(单位)分享社区拍摄经验,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成功经验?	邹乔
7 日			
上午	各小组讨论如何编辑访谈的短片		
下午	剪接短片	由田 帮忙个小组剪接,王成帮忙配音和制作片头片尾。	田犁 王成
20:30 -22:30	村民大会	村民大会的主要环节为: 分享茂县和小渔洞村民拍摄的短片 播放村民访谈的短片 选出下来要拍摄的主题	王晴飞 王 成
8 日			
10:00 -12:00	拍摄计划	就前一天晚上村民选出的拍摄主题,讨论拍摄计划。	田犁
12:00 -13:00	总结评估	先大组讨论 3 大环节: 1.3 天以来学到的 2.感受最深的 3.要改善的。 然后,分小金团队和其他学员两组,填写评估表格,对整体(3 次)培训和这次培训,做进一步的评估。	邹乔 小平
下午	回小金县城		
	回成都		

附表 5：四川 512 中心的两天集中培训

第一天：摄像和编辑	活动细节	注 释
9:00 样片《上梁》		
9:15 相互认识	介绍培训的背景、内容、纪律	主持：主办方
9:30 摄影培训	一、摄影基本知识 1.镜头与分镜头； 2.镜头的类别； 3.镜头叙事与 5W； 4.场景 5.样片《小鱼洞大桥开通》	注：在此阶段，镜头意识是一个关键点；学员在此基础上学习分镜头；分镜头的标准是需要用一组分镜头来说明一个事情的 5 个 W，即用镜头说明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谁，在做什么事情，事情是怎么发生发展的（此时的 WHY，宜改为 HOW，镜头擅长表达具体的过程）。
	二、摄影技术要求 1.讨论：什么样的镜头算是好镜头 2.归纳：镜头的技术要求；编辑需要的镜头；镜头的含义 3.新手的摄影“军规”	注：新手“军规”是一套简单实用的规则，可以让社区学员比较容易地避免新手爱犯的一些错误，快速有效地掌握拍摄技术，从而保证拍摄出来的素材是可用的。它包含如下内容：1 拍摄要稳；2 分镜头成组拍摄；3 调整好才开机拍摄；4 镜头与镜头间，要关闭拍摄之后再开始拍摄；5 慎用推拉摇移；6 每个镜头不短于 5 秒；
	三、场景与故事 1.场景——舞台剧；时空变换； 2. 场景的镜头内部关系，全景，细节，关系镜头； 3.场景间的转换——时空转换的关系，转换镜头； 4.样片《蓑衣》，讨论：多少个场景，场景间如何转换的，时空怎么变化的	

12:30 午餐与午间练习	某人要在办公室画张社区图,把它布置到会议室,讲解给别人听(3个场景,30个镜头以内,把事情交待清楚)	
14:30 回顾摄影培训的内容	抽人问答	
15:00 午间练习的回放和分享		
16:00 编辑培训	一、编辑的基本知识 1.讨论:影片的基本技术性要素;2.归纳:镜头、同期声、旁白,字幕,片头片尾;3.镜头组接逻辑——影像语言的核心 二、编辑的过程 1.场记;2.编辑大纲确定;3.调整思路,补拍等;4.多种影像要素的组合;5.编辑和合成;6.样片《王向兵接娃娃》 三、编辑和合成 1.编辑软件;2.素材导入;3.影像镜头组接;4.配音;5.字幕合成等;6.导出	
晚间练习	将午间拍摄的内容编辑成一个影片。	
第二天:编导培训		
9:00	样片《四哥电影路》	
	一、编导的基本知识 1.讨论影片的基本类型 归纳:虚构电影和非虚构电影——不同的影片与不同的拍摄和表现方法。 虚构——故事片 非虚构——新闻:(核心——变化) 非虚构——纪录片:(核心——状态); 专题片,真实电影,直接电影(同期声和解说词,真实的含义)。 2.影片的基本要素讨论	

	归纳:人物、故事、线索…… 三个层次:镜头——场景——结构; 贯穿结构的内部动力:线索;情绪 3.影片体裁和表现方式 故事片:故事结构,大纲,剧本,脚本 纪录片:线索——可能的故事和矛盾;素材——可能的素材;叙事的方法——专题式,直接电影,真实电影;复合式 4.纪录片的表达方法 样片《过江》	
12:30 午餐		
14:00	样片《小A的夏天》 二、影片构思与编导 1.影片构思的几个基本要点: 1.影片的目标和针对的观众;2.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和主要内容;3.体裁选择;4.片长;5.影片的限制性因素——资源、预算、时间等;6.影片构思的重要性 2.纪录片的编导 故事片——编故事;纪录片——找故事 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和影片类型选择合适的体裁; 影片的构思: 影片的基本要素的确定;(人物、线索、可能的故事与矛盾等) 影片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量——故事线索,影片的结构 纪录片的编导和制作过程 构思——确认(人物、可能的事等)——影片大纲——拍摄计划(预期事件、人员、设备、时间……)——剧组组织——拍摄(分享反馈与提高)——拍摄总结——补拍——编辑(确认编辑大纲,编辑计划,影片编辑制作,合成)——发行(分享、播出)——讨论 三、编导的实践练习 影片构思:咱们村的模范丈夫(拿出大纲)	
	发放评估表,同时播放样片:《谷魂》	主持:主办方

附表 6: 四川 512 中心的社区拍摄社区工作坊

1. 文化记录工作坊

地点:茂县松坪沟乡岩窝村

时间:2009 年 12 月 7 到 9 日

日程:

12 月 7 日上午出发,下午 6 点到达岩窝村。

(1) 协作者拍摄者介绍岩窝村项目点社区和机构情况。 7 日晚上

(2) 岩窝村项目点新作短片放映,分享和讨论。 8 日上午

(3) 各项目点新作短片放映,分享和讨论。 8 日下午

(4) 工作坊总结及联谊晚会。 8 日晚上

9 日上午 8 点岩窝村出发,下午 4 点到达成都。

2. 社区参与工作坊方案

地点:彭州小鱼洞镇大楠社区

时间:2010 年 1 月 9 到 10 日

日程:

(1) 工作坊介绍(PPT 马志勇 9 日下午 3 点 -3 点 15)

(2) 项目点介绍(PPT 潘晓龙 3 点 15-30)

(3) 影片观摩(潘晓龙 3 点 30-5 点 30)

① 《我们的文艺队》(潘晓龙 30 分)

② 电影小组分享(刘云、张奇、潘晓龙 30 分)

③ 观众主题讨论(周安菊、相清珍、徐尧珍、任天珍等 30 分)

④ 互动(其他项目点同事 30 分)

(4) 联谊晚会(刘云 9 日晚 8 点至 10 点)

① 节目表演(各项目点 1 个)

② 联谊活动(舞会、茶会等)

(5) 工作坊总结(马志勇 10 日上午 10 点至 12 点)

① 项目组总结

② 各项目点分享

② 结束语

3. 文化反思工作坊

地点:滴水岩村

时间:2010年2月2到3日

日程:

(1) 社区游(罗大述 何军 2日下午2点至5点)

① 社区介绍。

② 项目点介绍。

③ 游览:滴水山庄、仙女洞、老梨树、摘橘子。

(2) 看片会(罗大述 马志勇 2日晚上7点至10点)

① 工作坊介绍。

② 《我们的桃花节》放映。

③ 社区讨论。

(3) 研讨会(邹乔 马志勇 3日上午9点至12点)

① 滴水岩村文化反思。

② 各项目点文化反思。

③ 结束语

编委会名单

主 编：陈惠芳

执行编辑：田 犖

项目协调：邹 乔

研究员：高雪松 肖志欣 莫尚凝 刘易平

纪录片跟拍剪辑：马志勇 陈宇 田犖

照片拍摄：欧艳 毛磊 马志勇 高圭滋 郭净

项目实施

社区伙伴四川办公室

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

茂县社区可持续发展促进会（现协力品酿）

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

成都爱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NGO备灾中心

四川省茂县松坪乡岩窝村

四川省广汉市松林镇滴水岩村

四川省映秀黄家院村

四川省什邡市湔氐镇桐林村

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镇江桥村

四川省绵竹市广灵村

四川省小金县美沃乡和尚村

